

# 中国宏观分析与预测报告（2009 年第 3 季度）

## ——次高速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

毛振华 刘元春 朱 戎

**内容摘要：**利用“总供给-总需求分析框架”，对过去 30 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源泉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立、新型的全球分工格局已经出现、人口结构逐渐向老年社会过渡、城市化进程已经渡过其加速期、重工业化阶段已经完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支撑点已经开始步入其边际递减或总量衰退的变异阶段——体制转轨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开始衰退；全球化红利开始步入平稳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的加速增长将被贸易平稳增长所替代；人口红利已渡过拐点，人口负担的反向效应开始出现；城市化虽然依旧会稳步提高，但其产生的增长冲击力量在加速回落；工业化虽将进一步发展，但第二产业对整体经济的带动效应已远不如从前。

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可能将转向“消费率提升”、“城市化加速”、“服务业发展”、“技术创新与技术深化”以及“社会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五个方面，这些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的差距，未来仍有巨大的挖掘潜力，也正是机会所在。计量表明，中国消费率每提高 1%，带来的 GDP 增速的提高将达到 1.5-2.7 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每提高 1 个百分点，人均 GDP 将提升 2.25 个百分点；服务业占比每提升 1 个百分点，可带来经济增长提高 2 个多百分点。

考虑各种增长源泉的变异，利用模型模拟预测，结果表明，目前世界经济危机没有改变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趋势，但集中暴露了过去经济中的结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由此进入下行的调整区间，在应对经济周期性调整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的回升也会缓慢启动增长路径的变轨。在增长轨迹转变与新增长源泉的支撑下，中国经济增长一方面依然具有高速经济增长的态势，另一方面也将出现总体缓慢下降的趋势，中国经济将步入一个较长时期的“次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年平均增长率将由未来三年的 9% 左右逐步回落，到 2020 年之后降为 7.5% 左右。

对未来“次高速经济增长”的要素分解表明，未来各种要素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发生巨大变化，资本因素将下降，而技术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大幅度提升，劳动因素将在 15 年左右的平稳期后出现上扬的态势，但从绝对额来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依然具有的“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与高速

度”的特色。

从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来看，未来“次高速增长”将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但调整的速度较慢，经济结构的快速调整与增长方式的转换并不会同时出现。与此同时，调整的模式具有明显的需求先导型、产业内部深化等特点。

人们原来所想象的“内需驱动模式替代外需驱动增长模式”、“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替代投资主导增长模式”、“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增长模式替代资源密集增长模式”、“服务化驱动增长模式替代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驱动模式”的增长模式大转变并非想象得那么迅猛。因此，我们一定要在注重转型调整的同时，防止急于求成的思想和运作，漫长的增长模式转变中需要坚持六大动态平衡术：

1、在需求结构转型过程中必须注重总需求三驾马车的动态平衡术，外形驱动转向内需驱动并不是等于简单降低净出口的规模，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也不是等于单纯地压制投资的规模。中国出口投资驱动增长模式不仅有其深厚的国际分工体系基础，更为重要的具有内部储蓄基础，调整出口-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不仅依赖于传统粗放的开放政策和投资政策的调整，更重要依赖于国际分工环境和内在分配-储蓄体系的变化，简单进行压低出口和投资的转型方法只会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在需求快速下滑与结构冲突激化的双重压力下出现崩溃的局面。

2、在城市化加速的进程中必须重视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平衡，城市化带来的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是以全社会的社会改革为前提的，城市化的速度快于社会改革的速度不仅会带来城市化成本急剧增加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很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结构崩溃的导火索，使高速增长失去稳定的社会环境。

3、工业化驱动模式向服务业驱动模式转型中必须高度重视服务业与制造业、服务业与消费之间的互动，而不能简单通过打压工业投资和工业发展来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也不能通过简单提高服务业的投资来增加服务业在GDP的份额。进一步工业化、消费水平的提升与服务业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依然是服务业增长贡献率进一步提升的三大要点，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层次化分类处理。

4、在向新技术、新能源、新产业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进程中，必须重视需求型技术变迁与供给型技术变迁之间的匹配，重视产业的技术基础与经营基础的匹配、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匹配，避免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盲动症驱使下，陷入“新能源陷阱”与“动态比较优势狂躁症”之中。

5、应当重视后工业社会目标与工业化社会目标之间的平衡，避免过度利用后工业社会的目标来评判工业化发展的各种措施，防止出现盲目跟随发达国家的

发展目标和发展措施，使我国政策目标出现“内在冲突”、“目标无解”的困境。

6、中国社会与政治结构往往需要中国经济应当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未来中国经济在增长模式转变和新轨道运行的进程中依然有保证高速增长的基础，增长目标不宜进行大幅度的压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变轨并非与高速增长存在必然的冲突，“在高速增长中调结构”不仅过去是今后依然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报告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把当前以“反危机、防恐慌”的短期应对政策，转向以经济转型和培育新增长源为着力点兼顾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第二、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扩大居民收入占比，建立有利于提高消费率的消费需求刺激政策，形成以内需为主的需求结构。

第三、积极、稳健推进城市化进程，探索并推进农村土地，尤其是宅基地的资产化将扩大城市化的资本供给，进而扩大国内需求。

第四、构建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安全网。

第五、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结构转型。

第六、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扩大就业和培养中产阶级的产业载体。

第七、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下，建设公民社会与公共财政。

## 第一部分 问题的提出

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先导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宏观经济带来剧烈的冲击，2008年第3、4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出现深度下滑。但在中国政府强大的刺激政策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自2009年第二季度出现了强劲的反弹，复苏的迹象全面呈现<sup>1</sup>。由此，社会各界关注的核心开始从短期危机治理向长期经济增长问题转变，并提出了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战略性问题：

1) 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中国宏观经济的下滑是否是中国传统高速增长模式终结的标志，还是中国传统高速增长进程中的小插曲？全面复苏后的中国经济是否会步入全新的经济增长轨道，还是在传统路径上进一步发展？

2) 中国高速增长的传统基础是什么，这些基础是否已经达到其极致而进入衰减期，中国未来的高速增长是否必须寻找新的基础？

3) 传统经济增长源泉的耗竭是否意味着新的增长源应当在传统源泉的对立面之中寻找？未来可行的经济增长源泉应当是什么？这些新的源泉是否可以保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4) 新增长源泉与目标的确立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找到达到未来增长目标、发挥新经济增长源泉的有效路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轨是否需要长期的转轨过程以及相应的路径选择？

对于这些问题，社会各界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并做出了一些回答。这些研究和回答集中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 对于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的批判，特别是对于目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批判，认为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全面抛弃这种落后、不可持续的增長方式。

2) 对于传统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几大源泉：“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人口红利”以及“城市化”对中国高速增长的支持作用都已达到其极致，未来经济增长必须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的支撑点。

3) 对于未来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认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应当在传统经济增长源泉的对立面之中进行探寻，从而指出“新型工业化应当取代传统的工业

---

<sup>1</sup> 关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请参阅《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09年第2季度）：分化、振荡与复苏中的中国宏观经济》。

化”、“内需拉动应当取代外需拉动”、“消费拉动应当取代投资拉动”、“服务业推动应当取代工业推动”、“中西部崛起应当取代东部主导”、“技术主导型应当取代资金、劳动力等要素主导型”、“新产业推动替代传统产业推动”等未来经济增长源泉的目标。

4) 对于增长路径转轨方式的研究，集中指出“要转变到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就意味着需要在外部失衡调整的基础上收缩外需”、“要实现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就需要大幅度压低投资”、“要实现新产业推动型经济，就大力进行新技术、新产业与新能源的培育”、“要实现服务业主导型经济增长，就需要加大对服务业的投入和服务业的开放”、“要实现新型工业化就需要超越重工业化阶段”。

上述这些研究应当说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认识具有十分深刻和独到的一面，但却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很多研究先验地设定了大量的“后现代标准”来对我国这个中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过分否定性的判断，从而无视全球分工格局以及中国生活经济资源禀赋的状况；二是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源泉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定性认识，并缺乏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三是过分依赖于对立的视角来很多设定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以至于很多研究所设定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是相互冲突、根本不存在的。例如，“效益好、能耗低、污染小、速度快、技术高、就业多、可持续、结构合理、内外均衡”的经济增长目标虽然描绘了一个接近完美的经济增模式，但这个模式在现实和理论上都是不存在的，由该目标引出的方法在本质上也是无解的。四是过分忽视一种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前提条件，而进行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机械调整，从而忽略转轨进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以及短期与长期、转型与稳定之间的平衡。

上述这些问题决定了本报告研究的任务：第一、在统一的理论框架和计量基础上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基础和增长源泉进行研究，判断这些源泉和基础发展的趋势，以及它们是否可以支撑起中国未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第二、探寻未来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可行源泉，从而分清目前社会各界所提出的各种方案的可行性和可靠性；第三、利用长期增长模型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可能的速度，以描述中国经济增长可能的轨迹。第四、研究中国经济由传统增长基础转向新的源泉的可行路径，说明转轨成功的政策基础和策略选择，以批判目前哪些操之过急、甚至南辕北辙的政策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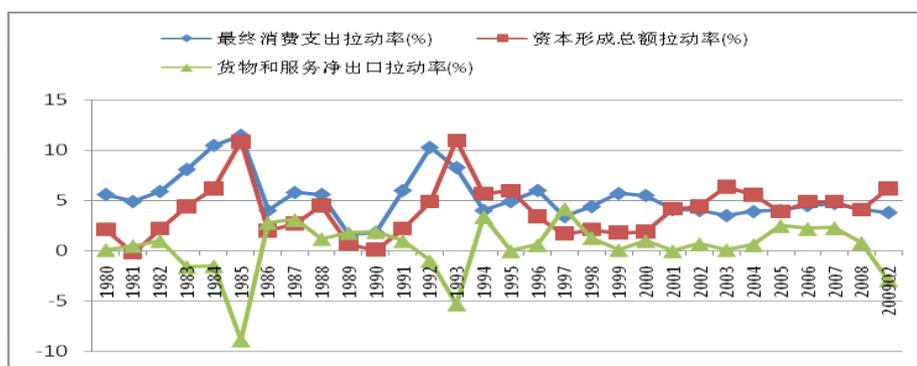
## 第二部分 中国高速经济的传统源泉及其变异

1、利用“总供给-总需求分析框架”，对过去 30 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源泉进行计量分析，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 30 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和基础主要有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人口红利、以及高储蓄高投资等五大载体。这些载体在中国 30 年高速增长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作用和发展趋势，其中很多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开始处于递减阶段。

利用“总供给-总需求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 1978 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经历了由短缺经济到基本供求平衡的一个过程，这期间供求变化的内在推动力在于通过“解放生产力”来发展生产力，以供给能力的扩大来弥补短缺经济的缺口，从而引致中国经济实现超高速增长。第二个阶段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 2008 年，这一阶段是我国经济从基本供求平衡到总供给逐渐大于国内总需求的阶段。但同时这一阶段赶上了经济全球化、信用消费和电子通信技术革命三者重叠的历史性机遇，这使得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黄金”的高速发展时期。

首先，从总需求的角度来看。

图 1 中国经济中三大需求对 GDP 拉动率(%)：1980-2009Q2。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投资需求始终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但从增长的边际因素角度分析，我们认为投资需求和外部需求是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全球化以来，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拉动作用明显。而与国际比较，中国的最终需求仍处于较低的水平<sup>2</sup>。

<sup>2</sup> 这是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角度计算的。而通常讲的拉动国民经济的需求因素是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

从具体的时间段划分来看，1978年~1985年以及1991年~2000年两段区间内，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超过三十年来的平均水平55.31%，而1986年~1990年以及2000年以来，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比较弱的，低于三十年来的平均水平；资本对GDP增长贡献率方面波动较大，三十年的平均贡献率水平为33.68%，其中高贡献率主要在1983年~1985年、1993年~1995年以及2001年~2008年三个阶段，其余时间资本对GDP增长的贡献低于平均水平；在出口的GDP增长贡献率方面，三十年的平均贡献率水平为8.01%，净出口在1986年~1991年以及2005年~2008年期间形成了明显的高贡献率，但2008年以来，其增长贡献率呈明显下滑的态势。2009年上半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7.6%，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3.4%，拉动GDP增长3.8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1%，对GDP的拉动为-2.9%，投资的快速膨胀有效的弥补了外需的不足。

其次，从总供给的角度分析。

**表1 供给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总时间段	子时间段			
		1979-2007	1979-1989	1990-1999	2000-2007	
对 GDP 的 贡献率 (%)	资本	53.5	43.6	54.5	66	
	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	25.3	45.6	14.7	10.5	
	其中	人力资本	12.2 (48.22%)	22.87 (50.15%)	6 (40.82%)	5.28 (50.28%)
		从业人员数	13.08 (51.7%)	22.73 (49.85%)	8.7 (58.18%)	5.26 (50%)
	TFP		21.2	10.8	30.8	23.5
	其中	技术进步	9.6 (45.28%)	6.57 (60.83%)	14.3 (46.43%)	7.9 (33.62%)
		市场化程度	15.89 (74.95%)	14.13 (130.83%)	23.69 (76.92%)	8.56 (36.43%)
		对外经济开放程度	5.24 (24.72%)	1.56 (14.44%)	6.09 (19.77%)	9.24 (39.32%)
		其余部分	-9.54 (-45%)	-11.5 (- 106.48%)	-13.24 (-42.99%)	-2.23 (9.49%)

1979~2007年间，资本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3.5%，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sup>3</su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5.3%和21.2%。其中，在2000~2007年间，资本对GDP的增长贡献更

<sup>3</sup> TFP可分解为技术进步、市场化和国际化以及剩余因素。

达到 66% 的高水平，而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贡献因素迅速下降为 10.5%。TFP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从 1979 到 2007 年，TFP 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 21.2%。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TFP 增长率增加了一倍，贡献率增加了 20 个百分点。进入 21 世纪之后，TFP 的增长率和贡献率出现明显的下降。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但在 2000 年之后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从 1979 到 2007 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 9.6%。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其贡献率大幅增加了约 8 个百分点，但 2000 年之后，又下降了约 7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之一是在技术研发上投资的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的质量问题影响了科技进步的速度和效果。从时间段 1990-1999 到时间段 2000-2007，中国的资本增长率提高了约 4 个百分点，达到了 14.16%，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了约 12 个百分点，达到了 66%，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却降低了约 7 个百分点。资本投入的高速增加和金融市场的完善导致的一系列诸如资金的流向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失调和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很有可能会导致科学技术向经济效益转化效率的降低。

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突出，但在 2000 年之后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从 1979 到 2007 年，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 15.89%。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其贡献率大幅增加了约 10 个百分点，但 2000 年之后，又大幅下降了约 15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 20 世纪 80 年代正是我国经济体制和市场条件发生剧烈频繁变化的时期，这必然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发生剧烈频繁变化，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一些制度上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从而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入 90 年代，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逐渐步入正轨，日益变得成熟有序，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地发挥了作用；而在 2000 年之后，在政策逐步推行到位之后，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不再突出了。

国际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稳步增大，在 2000 年之后已经成为经济的重要的推动力之一。从 80 年代到进入 21 世纪，国际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从最初的 1.56% 增加到 9.24%，并在 2000 年之后成为 TFP 所包含的三大因素中贡献率最大的一个因素。可见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成效显著，国际化程度持续加深。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外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国际化进程进入了新时代，因此对外经济活动对经济的推动力越来越大。

## 2、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完成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标志着中国市场化

改革对于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作用已达到顶点，未来进一步市场化所带来的制度红利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步入强烈的递减区域。以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政府体制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将取代以价格改革、企业改革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并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制度性动力来源。

中国市场化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其平均贡献率达到 15.89%。但是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全面的推进，它对中国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作用开始步入递减区域。按照份报告计量研究的成果，市场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在 1978-1989 年为 14.13%，在 1990-1999 年为 23.69%，在 2000-2008 年仅为 8.56%。这可以充分说明市场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新世纪已经处于边际递减的区域。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经济复苏之后，这种边际递减的趋势将会持续呢，还是会出现逆转？该问题的答案是，不仅递减的趋势会持续，而且递减的速度很可能步入加速衰减区间。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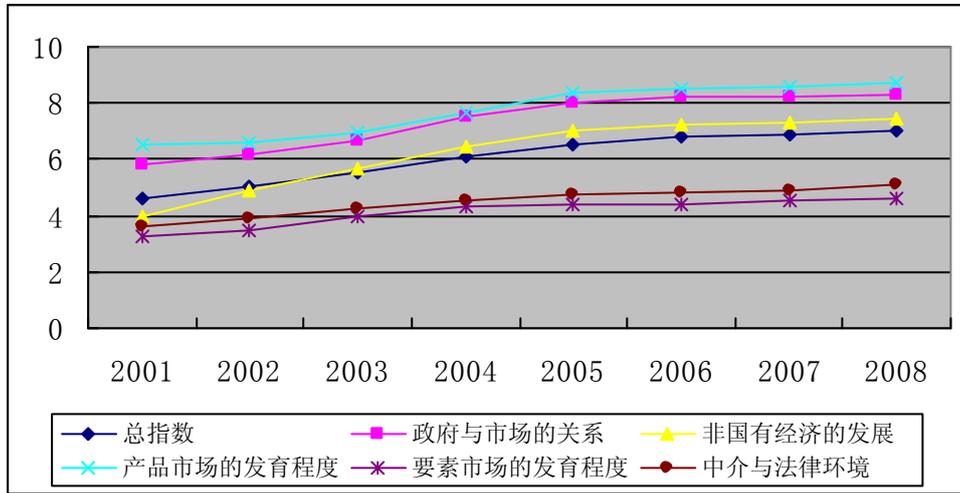
**第一、中国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总体市场化指数的增长已经步入递减区域，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作用将进一步衰减。**

按照国民经济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市场化指数研究团队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所所测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来看，中国市场化总指数在 2000 年以前处于不断加速上涨的状态，2001-2005 年处于匀速增长的状态，平均每年提高 8.9%，而 2006-2009 年却处于增速递减的状态，平均每年增长 2.4%（参见图 2）。

这种市场化程度的增长出现衰减的核心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加入 WTO 和大量相应制度改革之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如果按照欧美反倾销领域中市场经济地位标准和测度体系来测算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中国早在 2003 年就已经超过市场化的临界值——60%，到达 72.8%。到目前为止，中国市场化程度已经超过 85%，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和服务已经占到 95% 以上，80% 以上的企业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其市场化程度处于中等发展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正是这种较高的市场化程度，目前已有 97 个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也承诺将在 2009 年 10 月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来看，在市场化的推动下，我国的经济自由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在 2007 年至 2009 年的三年时间里，我国的自由化指数

分别为 51.8、52.8 和 53.2<sup>4</sup>。

图 2 中国市场化指数得分及其构成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成也就意味着中国体制转轨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通过市场化来获取资源配置改善效应的空间将越来越窄。从计量角度来讲，它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将大幅度减少。

第二、中国市场化水平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进一步提高的空间较小，其所涉及的深层次利益关系不仅将导致其未来进展的速度将大大降低，更为重要的是其进一步的提高不依赖于单纯的放权让利和体制性的转轨，而是依赖于以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政府体制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

虽然中国市场化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但依然存在发展的空间。不过，应当重点强调的是，由于未来所涉及的市场化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地方市场割据与中国大市场、大物流的建设；2) 国有经济改革特别是行政性垄断企业的改革；3) 地方分权财政体制的改革；4) 完善资源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5) 改革各种要素市场进一步推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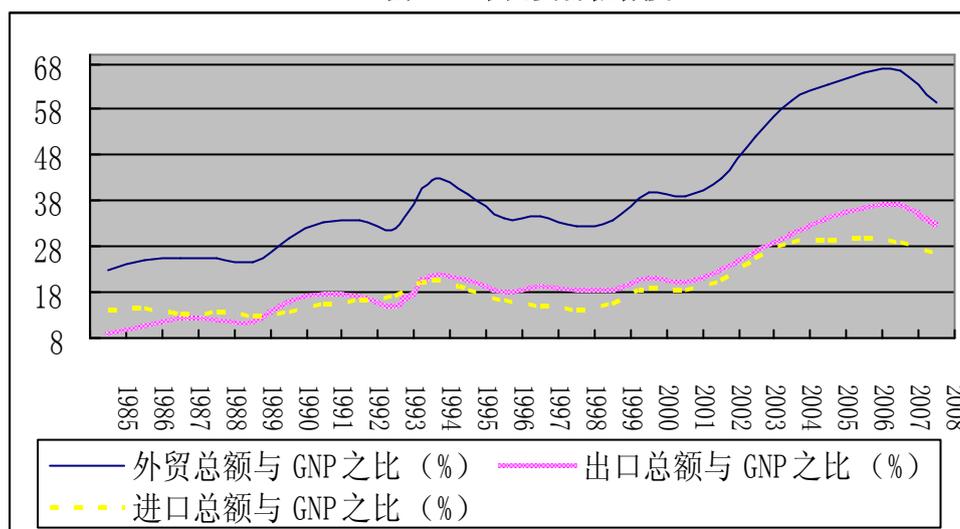
但是，上述这些改革并非单纯的市场化的问题，它不仅涉及了大量的深层次利益关系问题，而且涉及到大量的社会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其发展的进程不仅会很缓慢，而且其进展的速度取决于社会改革与政府体制改革的速度。例如，大市场的建设必须涉及中国“条块分割”的利益格局和行政区划；分权财政体制的改革必须以政治体制的改革和行政管理体系改革为前提；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不

<sup>4</sup>数据来源：数据根据 [www.heritage.org](http://www.heritage.org) 在线资料整理

仅涉及到工资谈判机制改革，还涉及到土地市场改革；要素的自由流通中，土地的自由流通和劳动力的自由流通必须以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农村社会体系的改革为前提，资本的自由流通必须以金融约束体制改革以及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为前提。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题的市场化将让位于以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政府体制为主体的社会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而无法成为推动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核心动力源。

3、中国高达 60%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历史上任何大国经济的极限。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转、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出口退税政策难有提升空间、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以及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六大因素的影响，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难以维持，并将步入递减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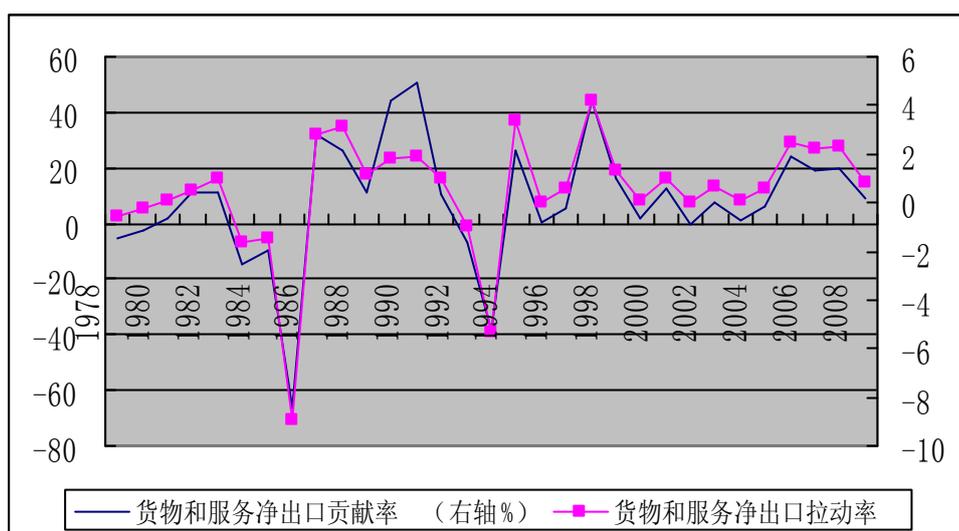
图3 中国贸易依存度



国际化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另一核心源泉。按照 C-D 函数测算，1978-2008 年期间，国际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24%，并从 1978-1989 年阶段的 1.56% 加速增长到 2000-2008 年期间的 9.24%。按照国民收入核算来看，1978-2008 年期间净出口对于国民收入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平均为 8.01% 和 0.45%，其中的转折点为 1994 年。从 1994 年开始，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基本处于正值，并且这一作用在 1997 年达到历史最高点，1997 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分别达到了 44.4% 和 4.2%。但在 1998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明显下降，一直到 2001 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分别下降到 -0.1% 和 0%。2001 年随着中国经济加

入 WTO，外需再次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经济也因此进入 2005-2007 年依靠外需促增长的“黄金期”。这一期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的年均值达到 21.03%和 2.33%，而波动性（标准差）仅有 2.663 和 0.153，贡献率和拉动率的单位波动风险带来的贡献率和拉动率高达 7.90%和 15.22%。但是，这种状况似乎被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所打断，2008 年中国净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仅为 9.2%和 0.8%，比 2007 年分别下降了 10.5 个百分点和 1.5 个百分点。而 2009 年估计和拉动率将全面由正转负，将达到-2.9%。由此提及的问题是，中国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将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将出现大逆转，由外需向内需全面转变？这个问题在长期战略性的答案是肯定的，即中国大规模、高速的出口增长模式将在未来 20 年内发生重大的转变，其理由如下：

**图 4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 GDP 的贡献率(%)与拉动率 (%) (右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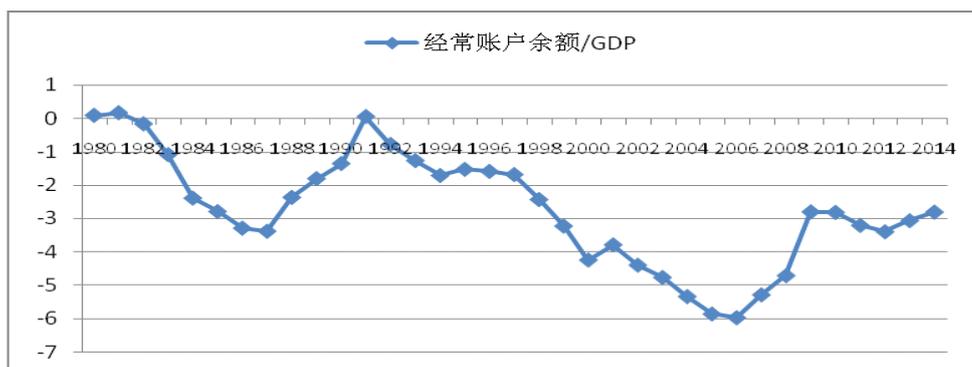
#### 第一、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外部不平衡的调整速度制约外部需求的空间。

美国经济调整外部不平衡的要求必然对世界经济的需求造成显著影响。伴随着 GDP 的大幅下滑和进口的大幅下降（2009Q1 比 2008Q4 货物进口下降了 548 亿美元，降幅达 30.6%）<sup>5</sup>，美国经常账户赤字/GDP 由 2008 年的 4.4%快速下降到 2009 年第一季度的 2.9%。但按照 IMF（2009）的预测，即使到 2014 年美国的外部赤字/GDP 也有 2.82%。如果按照这样的调整速度，可以预计的是美国要实现外部基本平衡需要 10 年左右的时间。从欧盟的外部不平衡来看，欧盟从 2005 外部开始出现赤字，贸易赤字/GDP 为 0.093%，到 2009 年将达到 1.331%，即使

<sup>5</sup> 数据来源：U.S.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First Quarter 2009, BEA, June 17, 2009.

到 2014 年也有 0.229% (图 5)。考虑到 2007-2008 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中的 40% 以上的份额是中美贸易导致的, 中美之间的外部不平衡调整的压力越来越大。美国和欧洲经济外部不平衡将在未来 3-5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约束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空间。

**图 5 美国经常账户余额/GDP (%) 变化趋势: 1980-2014。**



注: 2009 年之后是预测值。

## 第二、中国货物出口地的经济增长大幅度放缓制约外部需求增长的潜力。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全球贸易大幅萎缩。据世界贸易组织 (WTO) 统计, 2009 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下降 31%, 二季度全球货物贸易额同比收缩 33.1%。世界贸易组织同时预计, 2009 年全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额下降 29%, 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贸易量下降 10% (图 6)。

**图 6 全球货物贸易急剧萎缩**



对我国而言, 中国经济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的未来三年 (2009-2011 年) 的经济增长大幅放缓 (表 2)。2005-2007 年这些国家和地区吸收了中国出口总额的约 85%, 因此,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就决定了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依靠出口促增长的潜力。

**表 2 中国经济主要出口地经济增长的变化 (%)**

	发达经济体	欧元区	美国	日本	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	亚洲 5 国	印度	巴西	俄罗斯
2005-2007	2.77	2.44	2.56	2.12	5.35	5.90	9.45	4.47	7.54
2009-2011	-0.51	-1.26	0.23	-0.21	-0.47	2.22	5.68	1.13	-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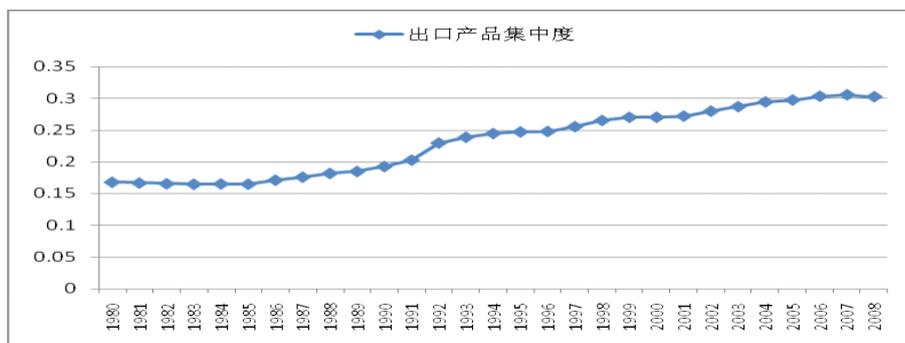
注：（1）发达经济体包括全球最发达的 33 个国家和地区；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地区和台湾；亚洲 5 国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2）2005-2007 年和 2009-2011 年的增长率均为上一年的 GDP 的加权平均值，2009 年后的数据均为 IMF 的预测值。

未来主要经济体增长率的下降将是导致中国外部需求大幅下降的根本原因，也是未来 3-5 年制约中国经济外部需求的主要因素。

### 第三、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逐步界定了中国出口品的国际市场容量。

在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出口的专业化分工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并形成了制造业的垂直分工环节，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集中度呈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1980 年出口品的集中度为 0.168，1990 年为 0.193，1997 年为 0.256，2008 年达到 0.303（图 7）。此外，Amiti and Freund(2007)的研究也表明，出口份额中排名前 70 名的 Gini 系数由 1992 年的 0.46 上升到 2005 年的 0.55，而排名前 100 名产品的 Gini 系数由 1992 年的 0.35 上升到 2005 年的 0.50，出口产品的专业化程度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图 7 中国出口产品的集中度（赫菲达尔指数）：1980-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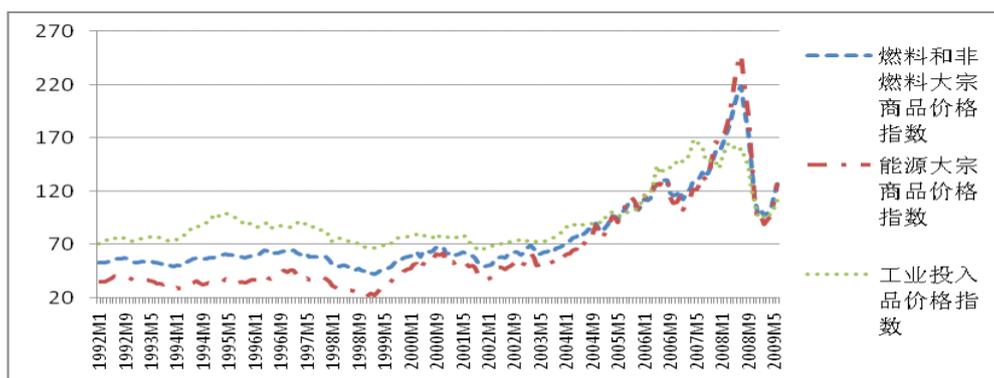


出口的专业化一方面能够通过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专业化也意味着特定的市场容量。因此，给定全球市场的容量，出口产品的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界定了中国出口增长的空间。

### 第四、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以及汇率升值压力制约了出口品的国际竞争力。

从中国进口结构来看，2002 年以来，60-70%的进口品是中间品，而大宗商品进口约占 25%。但近年来燃料和非燃料大宗商品、能源大宗商品以及工业投入品的价格变化轨迹表明了大宗商品低价格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图 8）。

图 8 大宗商品和工业投入品价格指数的变化：1992M1-2009M6。



注：价格指数以 2005 年=100 为基期；能源大宗商品包括原油、天然气和煤。

从国内的劳动成本来看，低工资一直是中国出口品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但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以及改革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无疑将会提高企业的劳动成本，中国经济过去赖以依存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会不断缩小。根据《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1995—1999年期间中国制造业每个工人的劳动力成本，相当于美国的1/40，日本的1/43，韩国的1/15，泰国的1/4，甚至比印度还低。但近些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是不断下降的。依据美国劳工部最近的统计数据，2000-2007年美国、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年均下降1%、3.5%和2.0%。因此，中国制造业的劳动成本优势必将进一步缩小。

从人民币汇率来看，2005年汇率市场化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基本处于上升通道，汇率升值无疑对出口会产生负面影响。由于一般贸易的份额呈现上升态势。2002年一般贸易占加工贸易的比例为75.6%，而2007年达到87.2%，这一方面说明了制造业国内分工链正在逐步形成，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参与出口企业的初级产品供应链中，这将进一步降低出口企业进口初级产品可能存在的市场风险。另一方面也说明名义汇率的升值会更大程度上降低中国出口品的价格竞争力和外部需求。

#### 第五、逆周期的贸易政策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

在美国调整外部不平衡和全球经济下滑的双重压力下，逆周期的贸易政策将进一步约束中国货物出口的空间。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数量分别增长28%和27%。依据WTO秘书处2009年5月7日发布的数据，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中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同时，部分国家提高对中国出口品的进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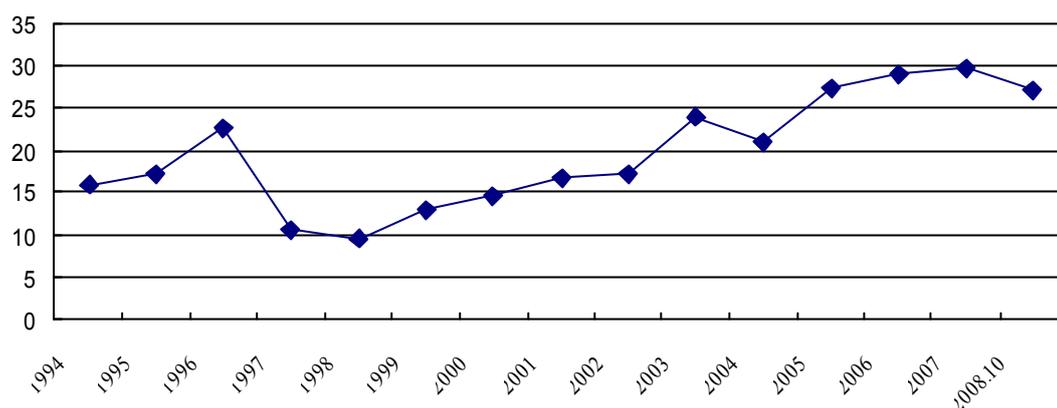
关税、实施绿色技术壁垒等一系列新的贸易保护举措。在全球经济和贸易尚未出现明显改善和美国外部不平衡调整没有达到其合意的水平时，这种逆周期的贸易政策会持续下，出口形势短期中不会得到明显改善。

#### 第六、出口退税政策难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1985 年以来的以出口退税对于降低企业成本、扩大外需起到了积极作用。1985 年出口退税占出口额的 2.43%，1995 年上升到 4.41%，后受到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但在出口促增长的“黄金期”2005-2007 年达到了 5.53%。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这意味着大约提高了出口企业 5.53% 的利润率。

从出口退税占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比例来看，波动比较大，2005-2007 年期间这一比例高达 28.7%（图 9）。考虑到同期增值税和消费税占到税收总体收入的 41.0%，因此，进一步扩大出口退税的空间极为有限。

图 9 出口退税占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比例（%）：1994-2008.10。



4、中国工业化已达到重化工化的顶点，工业占比已经达到历史和国际的高位，在工业产能过剩严重、资源与环境等瓶颈因素日益突出、投资效益开始下滑、技术鸿沟日益扩大等因素的约束下，中国工业化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必将面临巨大的变革，传统工业化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将步入其衰退期。

我国 2008 年的工业化程度达到 42.9%，工业对 GDP 的增长贡献率达到 46.1%（图 10），我国的工业化快速进程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长期以来我国粗放式的工业化不仅对我国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还带来了当前产能的极大过剩，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未来我国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将受制于环境和资源的约束，传统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亟需改变。

图 10 我国工业化程度以及工业对 GDP 的增长贡献率

第一、工业化程度的国际比较表明，当前我国工业化程度已接近发达国际工业化程度的历史最高点，未来继续以加强工业化程度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

从国际比较角度看，我国1978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44.09%，2008年仍高达42.9%，1970年这一比重为36.5%，可以认为1970-2008年的38年间，这一比重一直在提高。有关研究表明<sup>6</sup>，上世纪完成工业化的主要经济体，其工业化进程平均耗时15-20年，完成之际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1/3左右（日本43%，韩国30%，中国台湾39%）。相比之下，中国的重工业化已经历了38年，重工业之路过头使得经济比例失衡，服务业被挤压。日本虽然工业化程度高达43.2%，但日本之后为过度重化工业付出了惨重代价——长达十多年的产能过剩与通缩。借鉴历史同时考虑当前外需萎缩以及未来更加严格的环境和资源约束，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未来继续以加强工业化程度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

**表3 工业化程度的国际经验比较**

国家和地区	工业增加值比重最高		1970年工业增加值比重(%)	2007年工业增加值比重(%)	工业增加值比重最高年份距2007年(年)
	比重(%)	年份			
英国	36.3	1970	36.3	17.3	37
德国	39.1	1970	39.1	25.1	37
澳大利亚	30.1	1970	30.1	20.7	37
日本	38.8	1970	38.8	22.8	37
瑞典	30.9	1974	29.5	23	33

<sup>6</sup> 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意大利	32	1976	30	20.8	31
法国	28.4	1978	27.1	14.9	29
加拿大	30.5	1979	28.8	26	28
瑞士	26.1	1980	25.7	21.9	27
南非	45.2	1980	34.1	28.3	27
美国	29.3	1981	29.1	17.1	26
匈牙利	37.9	1982	37.6	25.4	25
新西兰	27.2	1982	24.8	18.4	25
巴西	35.5	1984	30.4	23.8	23
中国香港	25.6	1984	23.1	6.4	23
以色列	24.7	1984	24.2	16.4	23
中国台湾	43.4	1986	33.8	26.1	21
墨西哥	31.4	1987	27	20.6	20
韩国	34.5	1987	20.9	31	20
新加坡	32.2	1988	24	26.9	19
波兰	43.4	1990	42.4	25	17
俄罗斯	39.7	1991	38	31.8	16
印度	22.7	1995	15.6	20.9	12
巴基斯坦	24.8	2005	17.3	24.6	2
马来西亚	45.9	2006	24.4	44.1	1
泰国	41.4	2006	18.8	41	1
<b>中国</b>	<b>43.5</b>	<b>2007</b>	<b>36.5</b>	<b>43.5</b>	<b>0</b>

资料来源：银河证券研究报告

第二、我国传统“制造大国”的形成得益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以及外部需求的膨胀，但在西方发达国家“去杠杆化”政策的作用下，全球贸易严重萎缩，我国外需面临严峻挑战；同时在全球低碳经济的未来发展目标下，我国高污染、高消耗的出口导向型传统工业模式难以为继，如何实现“制造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是制约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国际转移的机遇，同时受益于低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我国制造业迅速发展，并成为制造业大国。但如今，随着全球经济衰退导致的需求萎缩，以及劳动力成本提升、人民币升值、环境代价高昂等问题影响，我国制造业的出口前景堪忧，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将有所下滑，因此，产业升级已迫在眉睫，制造业亟需转型，出口导向型的传统工业模式将难以为继。

第三、高度工业化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严重，未来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大背景下，工业投资增长速度将明显放缓，高速工业化带来的投资高峰期已过。

当前，高度工业化带来的产能过剩的矛盾在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中全面凸显，未来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国的工业投资增长速度将会明显放缓，兼并重组和淘汰落后产能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从长期来看，我国工业化将面临调整和转型的时期，以高速工业化带动投资的高峰期已过。

5、人口红利逐渐衰竭，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削弱，中国较长时期内依靠人口红利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将不复返。

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依赖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低成本的劳动力价格优势，人口红利支撑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随着我国老龄化比例不断提升以及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的丧失，我国人口红利逐渐衰竭。

第一、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人口结构已进入红利的拐点时期。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除了改革开放政策外，还得益于从 1950~1970 年代的高出生率带来的 80 年代后人口红利的爆发。研究表明，我国从 1979 到 2007 年，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 13.08%，并呈现逐渐下滑的确实。此外，近些年来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每年还在增加，但增加数量越来越少，2005 年我国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55.56%，2006 年和 2007 年连续两年下降，分别为 55.53%和 55.52%，伴随着 2008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我国经济将进入下行周期，经济活动人口比重会进一步下降。根据 2005 年的统计，中国 60 岁以上人口是 1.44 亿，占全国人口的 11%，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呈现“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特征。

另外，从国际比较的角度，2006 年我国 15-64 岁年龄人口比重为 71.4%，在主要人口大国最高，继续升高的潜力很小（表 4）。据此，我们认为，实际上的人口红利在 2005 年已经达到顶峰，之后将逐步回落。此外，我国近期劳动力成本的政策性上升将进一步透支人口红利，因此，依靠人口红利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与此同时，人口结构进入红利拐点所带来的工作年龄人口占比萎缩也将导致储蓄率的降低，未来随着劳动力成本和资金成本迅速上升，经济增速均面临下调压力。

**表 4 世界主要国家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2006年）**

国家和地区	年龄构成(%)			抚养比
	0-14岁	15-64岁	65岁以上	
世界	27.9	64.7	7.4	0.6
中国	20.9	71.4	7.7	0.4
孟加拉国	35.0	61.3	3.7	0.6
印度	31.6	63.0	5.3	0.6
印度尼西亚	28.0	66.4	5.6	0.5
日本	13.9	65.8	20.2	0.5
哈萨克斯坦	22.6	68.9	8.6	0.5
朝鲜	24.5	68.4	7.1	0.5
韩国	18.1	72.1	9.8	0.4
巴基斯坦	37.7	58.4	3.9	0.7
菲律宾	34.6	61.4	4.0	0.6
新加坡	18.8	72.4	8.7	0.4
斯里兰卡	23.7	68.9	7.4	0.5
泰国	23.5	69.3	7.2	0.4
越南	28.8	65.8	5.4	0.5
墨西哥	30.4	64.1	5.5	0.6
美国	20.6	67.0	12.4	0.5
阿根廷	26.1	63.6	10.3	0.6
巴西	27.6	66.1	6.3	0.5
委内瑞拉	30.8	64.0	5.2	0.6
法国	18.1	65.3	16.6	0.5
德国	14.1	66.7	19.2	0.5
意大利	14.0	65.8	20.2	0.5
俄罗斯联邦	15.1	71.3	13.7	0.4
西班牙	14.4	69.1	16.5	0.4
土耳其	28.9	65.6	5.5	0.5
乌克兰	14.4	69.3	16.3	0.4
英国	17.7	66.3	16.0	0.5
澳大利亚	19.3	67.8	12.8	0.5
新西兰	21.0	66.5	12.4	0.5

注：抚养比指 0-14 岁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与 15-64 岁人口之比。

第二、随着新的《劳动法》的实施、未来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收入分配格局的改革，将导致我国劳动成本将有所上升，低廉劳动力的时代已不可复制。

从国内的劳动成本来看，低工资一直是中国出口品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但随着国内劳动收入分配矛盾加剧，1992-2005年间，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由69.23%降至59.41%，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居民获得的劳动报酬净额占国民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下降了5个多百分点，而同期政府支付给居民的劳动报酬净额上升了1个百分点，企业支付给居民的劳动报酬净额占比下降了6个百分点。这说明居民在初次分配中收入比重的下降，主要原因是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杨天宇，2009）。而未来中长期中内需的核心问题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因此，改革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无疑会提高企业的劳动成本。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过去赖以依存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会不断缩小。根据《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1995—1999年期间制造业每个工人的劳动力成本，相当于美国的1/40，日本的1/43，韩国的1/15，泰国的1/4，甚至比印度还低。但近些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是不断下降的。依据美国劳工部最近的统计数据，2000-2007年美国、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年均下降1%、3.5%和2.0%<sup>7</sup>。因此，中国制造业的劳动成本优势必将进一步缩小。

6、高储蓄率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了极为充足的资本支撑，高储蓄率带来高的投资率，而高投资率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高储蓄率与高投资是支持中国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要素。但未来随着社保制度的完善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依赖高储蓄拉动经济增长将出现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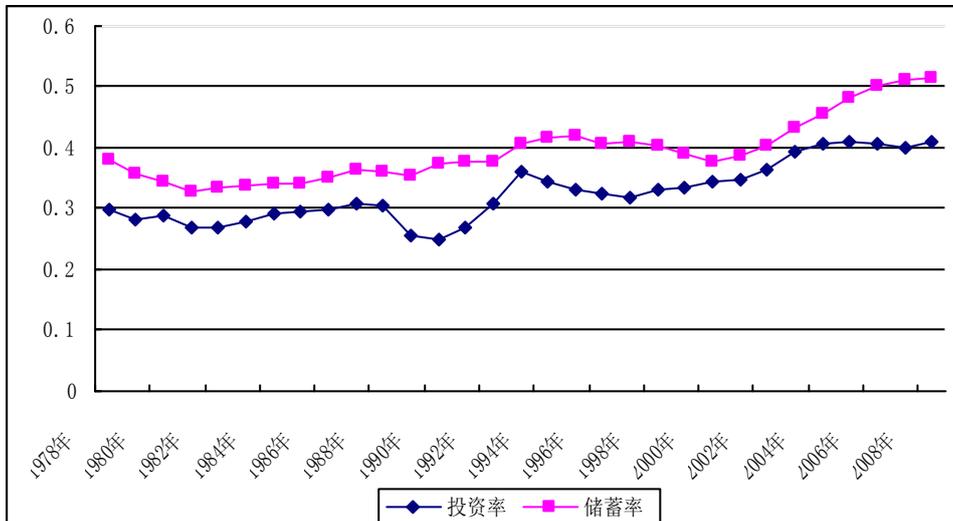
我国国民储蓄率从1980年开始，呈现出持续增长状态，保持了相当高的水平，始终是在30%以上，很长时间在40%以上，在2005年更达到46%的高水平（图11）。高的储蓄率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了极为充足的资本来源，进而支撑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投入强力推动。从增长速度来看，无论是在总时间段还是在3个子时间段内，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都是最快的。从1979到2007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0.75%，高于GDP的增速。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言，在总时间段和在3个子时间段内，资本也都是最大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3.5%，高于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与TFP的贡献率之和。从三个子时间段的发展趋势上来看，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持续上升，对经济

---

<sup>7</sup>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March 3, 2009),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and Unit Labor Cost Trends 2007, Revised.

增长的贡献率也大幅增加，每两个子时间段之间的贡献率增幅都在 10 个百分点以上。

图 11 1978-2008 年期间中国的储蓄率与投资率



相关研究表明，高国民储蓄率和我国的人口结构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说，工作年龄段的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越高，储蓄率就越高。如果社会进入老龄化时代，由于要动用储蓄的人多了，能够储蓄的人少了，那么全社会的国民储蓄率就会下降。而随着我国逐步满足老龄化社会，我国高储蓄的状况将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此外，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局面用于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的预防性储蓄将下降，储蓄率也因此将会下降。因此，未来随着社保制度的完善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依赖高储蓄拉动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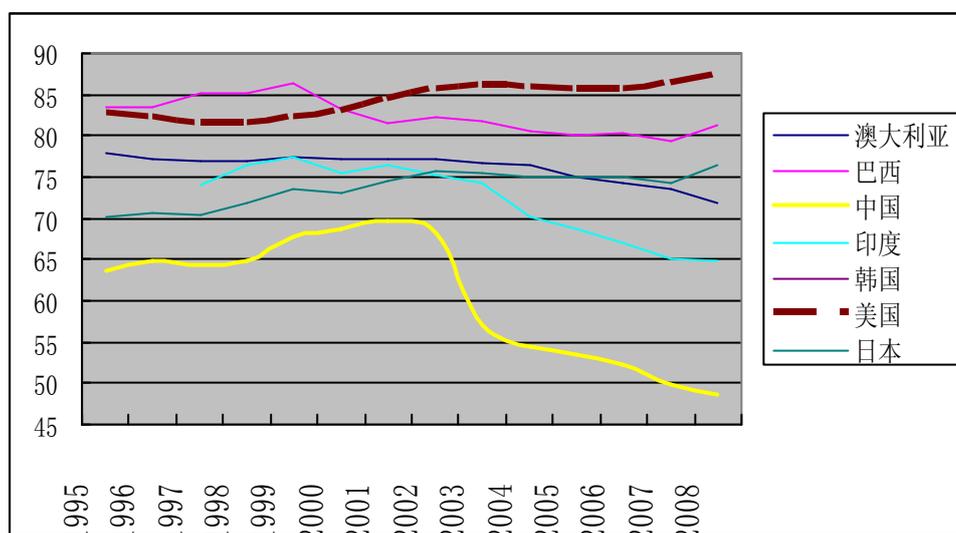
总体上，我们认为改革开放 30 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五大数据源泉和基础中，各因素均已发生衰减或变异：未来市场化进一步改革的红利将逐渐递减；受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外部不平衡调整的压力、全球经济增速深度下滑和复苏的不确定性、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出口退税政策难以提升空间、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以及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六大因素的影响，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难以维持和提升；当前工业化过程已达到历史和国际的高位，并接近尾声，未来工业投资增长速度将会明显趋缓；人口红利逐渐衰竭，未来储蓄率将逐步降低，中国较长时期内依靠人口红利和高储蓄率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将出现变化。

### 第三部分 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可能的新源泉

在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传统源泉发生变异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未来我国经济可能的新增长源泉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改善居民消费结构并提高消费率、继续推进城市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在加大自主创新和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加快社会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1、中国消费存在大幅度提升的空间，由“投资大国”、“制造大国”以及“高储蓄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第一边际推动力。计量表明，中国消费率每提高 1%，带来的 GDP 增速的提高将达到 1.5-2.7 个百分点。

图 12 各国最终消费率 (%)



中国目前是世界储蓄率、投资水平以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这些变量的参数都已经处于临界值，对于中国未来经济的高速增长的作用开始处于递减的趋势，但是，中国依然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因为中国消费率基本上处于世界的最低水平，到 2008 年，中国的消费率与澳大利亚、巴西、法国、印度、意大利、俄罗斯、韩国、日本、美国相比分别低 23.2、32.7、31.6、16.2、30.6、16.721、25.7、39.5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在过去从 2001 年最高点 69.7% 直线下降到 2008 年的

不到 49%。由此产生的空间是：第一、中国消费水平如果能够在未来 10 年内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76%），那么未来每年提升的空间将达到 2.7 个百分点，每年对 GDP 的直接推动将达到 4-7 个百分点；第二、如果中国消费水平在未来 8 年内能够提升到 2001 年的水平（69.7%），那么平均每年提升的空间将达到 2.63 个百分点，每年对 GDP 的推动也将达到 3.9-6.8 个百分点。由此，如果能够成功启动中国的消费，我们就能保证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中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恶化。1985 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曾缩小到 1.86:1，绝对差距 342 元；2008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 3.31:1，绝对差距达到 11020 元。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增长产生较大影响，1984 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只有 2.15:1，绝对差距 416 元，2008 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扩大到 3.07:1，绝对差距 7582 元（图 13）。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严重制约了消费对经济的增长拉动作用（图 14）。

图 13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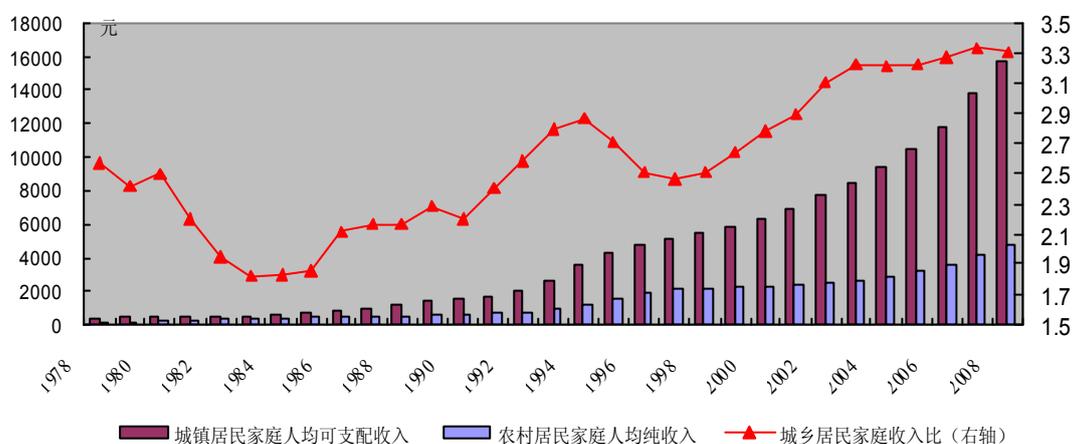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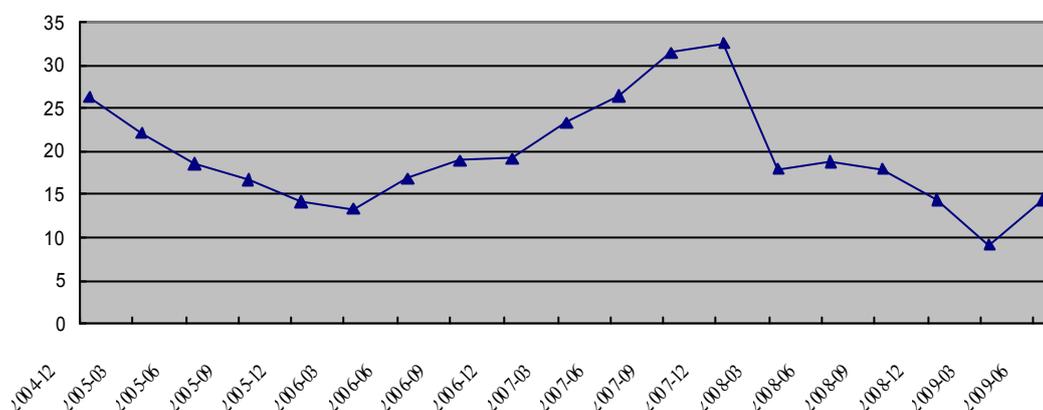


图 14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情况

此外，从我国居民新增贷款占新增信贷总额的比重可以看出，我国个人消费信贷的比重有所下滑，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巨额的信贷投放量中用于个人消费的信贷不断下降，而居民消费信贷既是银行的优良资产，又是扩大消费的重要渠道。这种逆结构调整的举措必须得到纠正。这是未来我国在货币政策中所需要调整的一个方向，增加个人消费信贷的比重应当成为促使国内消费率的上升重要举措。

图 15 我国居民新增贷款占新增信贷总额的比重



因此，以当前较低的消费率水平难以承担未来经济增长新的源泉任务之重，深入探究当前国内消费不足的原因是我们启动新的增长源泉的必要前提。我们研究认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长期下降趋势是导致居民消费不足的核心原因。而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例不断下降的原因是居民在收入分配体系中处于弱势状态，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弱势地位在再分配中也没有得到纠正<sup>8</sup>。

依据 1992-2005 年资金流量表的实物表，1992-2005 年期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 69.23% 降至 59.41%，下降了近 10 个百分点（表 5）。而与此同时，企业可支配收入占比则上升了 8 个多百分点，政府可

<sup>8</sup> 请参见中国人民大学 2009 年一季度宏观报告分报告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张效应》

支配总收入占比也上升了1个多百分点。这种此消彼长的趋势显然会抑制居民的消费能力。

**表5 居民部门各项收入占国民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 (%)**

	劳动报酬净额占比	其中：政府支付的劳动报酬净额占比	其中：企业支付的劳动报酬净额占比	财产收入占比	增加值占比
1992	36.66	5.90	30.76	4.55	28.97
1993	37.70	5.89	31.81	5.26	26.37
1994	35.28	5.99	29.30	5.96	28.00
1995	37.23	6.30	30.92	5.54	27.46
1996	33.94	7.01	26.93	5.48	29.28
1997	32.98	7.51	35.47	4.58	29.49
1998	31.99	8.91	23.08	4.65	30.30
1999	31.91	9.80	22.10	3.75	30.87
2000	30.63	9.27	21.37	3.50	31.79
2001	31.36	9.59	21.77	3.41	30.32
2002	34.69	10.45	24.23	3.26	28.64
2003	33.35	9.68	23.67	2.80	28.27
2004	29.66	6.83	22.83	2.64	28.05
2005	31.53	6.93	24.60	1.88	27.96

除了劳动报酬净额之外，居民财产收入占国民初次分配收入比重也呈下降趋势，14年中下降了2个多百分点。这种变化趋势与居民财产收入的来源结构有关。从资金流量表中可以看出，居民的财产收入中主要是利息收入，红利收入很少（如2005年只占12.7%）。这就使居民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给企业带来的利润增长。这也意味着在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和企业收入占比可能出现此消彼长的趋势。事实也正是这样。从表6可以看出，1992-2005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下降了9个多百分点，而同期企业收入占比却提高了7个多百分点。

**表6 各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收入比重 (%)**

	居民部门		政府部门		企业部门	
	初次分配	再分配	初次分配	再分配	初次分配	再分配
1992	68.89	69.23	15.53	19.22	15.78	11.55
1993	67.74	67.76	16.83	19.32	15.43	12.91
1994	67.68	66.80	16.40	18.61	15.92	14.59
1995	68.75	67.94	15.35	17.42	15.91	14.65
1996	67.23	69.29	15.53	17.15	17.24	13.57
1997	65.71	68.13	16.17	17.51	18.12	14.37
1998	65.61	68.14	16.87	17.53	17.53	14.33

1999	64.98	67.11	16.95	18.58	18.07	14.31
2000	64.36	64.81	16.69	19.54	18.94	15.65
2001	63.53	63.78	18.36	21.08	18.11	15.14
2002	65.28	65.18	17.48	20.49	17.25	14.32
2003	63.20	62.68	17.98	21.85	18.82	15.47
2004	57.68	57.83	17.84	20.38	24.48	21.79
2005	59.59	59.41	17.48	20.55	22.93	20.04

表5和表6显示，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对提高居民消费有重大作用。以表5为例，如果居民从企业获得的劳动报酬净额占比恢复到1995年水平，按照2008年的GDP估算<sup>9</sup>，大致可以增加1.9万亿元的居民收入；如果2008年居民储蓄率保守地假定为35%（35%是1992-2003年居民储蓄率的最大值），则将增加1.23万亿元的居民消费；再以表5为例，如果企业通过增加分红等措施使居民能够分享经济增长，使居民财产收入占比恢复到1998年水平，则按照2008年的GDP估算，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将分别增加8300亿元和5400亿元。

从表6可以看出，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在再分配中得到校正。1992-2005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比重也不断下降，甚至在其中的5年（1994、1995、2002、2003、2005），再分配之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反而低于在初次分配中的居民收入比重。从表6可以发现，再分配之后企业部门的收入比重也有所下降，而政府部门的收入比重，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呈上升趋势。

**表 7 政府再分配环节中主要资金来源、运用项目同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关系**

	社会保险缴款占比 (1)	收入税占比 (2)	其中：居民缴纳的 收入税占比	(1) + (2)	社会福利支出占比
1992	1.37	3.82	0.02	5.19	2.69
1993	1.47	2.58	0.08	4.05	2.47
1994	1.53	1.64	0.02	3.17	2.35
1995	1.68	1.30	0.02	2.98	2.38

<sup>9</sup> 资金流量表里的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即国民再分配总收入）相当于当年用三种方法（生产法、收入法、支出法）核算的GDP的综合结果，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加上经常转移后就是国民初次分配总收入。由于经常转移是国内各部门之间的转移，对国内总量的影响不大，因此我们可以用2008年的GDP数字近似地代表当年的国民初次分配总收入和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具体请参见唐杰（2006）。

1996	1.80	1.80	0.29	3.60	2.47
1997	1.98	1.76	0.35	3.74	3.05
1998	2.02	1.78	0.44	3.80	3.46
1999	2.53	2.42	0.53	4.95	3.26
2000	2.81	3.03	0.76	5.84	2.91
2001	3.20	3.24	1.03	6.44	3.59
2002	3.86	3.62	1.15	7.48	4.29
2003	4.13	3.78	1.20	7.91	3.83
2004	3.58	3.02	1.08	6.60	3.85
2005	3.75	3.52	1.12	7.27	3.95

从表7还可以看出，政府在再分配中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社会保险缴款和收入税，其中收入税又包括居民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而政府在再分配中的支出主要是社会福利支出。将政府的再分配收入和支出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在上述14年中，政府再分配收入在任何一年都高于再分配支出，其中有的年份高一倍以上。这说明，政府并没有发挥利用再分配功能调节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作用。相反，政府在再分配中筹集的收入，有近一半都用于与社会福利开支无关的用途。这种做法对于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是相当大的，它不仅减少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且拖延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从而增强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间接起到了抑制居民消费的作用。如果政府在再分配之后的收入比重与再分配前相比不上升，即所有再分配收入都用于社会福利开支，则按表6的数字，仅2005年就可以让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再分配收入的比重提高3.3个百分点；假定2008年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开支给居民收入带来的提高幅度也是3.3个百分点，则大致可以增加9900亿元的居民收入和6500亿元的居民消费，这还不包括社会福利开支增加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减弱带来的消费增加。

综上所述，如果通过企业合理地增加劳动者报酬支付、增加分红和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和再分配中的收入比重得到合理的增加，则按照本报告以2008年GDP数字进行的估算，共可以增加2.42万亿元的居民消费需求。这个数字将大大超过仅在居民部门内部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增加的居民消费。我们曾估算过仅在居民内部进行收入再分配对居民消费的扩张效应，结果发现，在一个较为极端的收入再分配假定之下（中低收入阶层各收入组的收入份额均提高10%、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下降27.5%），根据2007年数字进行估算，只能增加约320亿元的居民消费（杨天宇，2008）。可见，尽管调整居民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可以起到扩张居民消费的作用，但这个作用要远远小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居民消费的扩张效应，因此，从长期来看，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是大力提升消费率的重要路径，也是未来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的必然选择。

2、城市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重要载体和源泉，是促进投资、改善经济结构，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和国内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每提高 1 个百分点，人均 GDP 将提升 2.25 个百分点。

一般认为，城市化会经历缓慢发展-较快发展-较慢甚至停滞的三个阶段，即城市化都将经历发生、发展、成熟三个阶段。它们之间有一个统计上显著相关的 S 型曲线关系。根据这个 S 型曲线和世界各国数据，即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城市化水平偏低世界平均水平 12.8%。这表明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也表明中国正处于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时期。依据我们对全球城市化进程的研究，城市化速度最大值发生在人均收入 PGDP=4090.49 国际元左右<sup>10</sup>。而我国 2007 年按照 2005 年不变价计算的国际元收入大约为 4160 左右，恰好处于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时期。通过对历史长时间序列比较研究发现，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水平只相当于美国 1910 年、日本 1960 年和韩国 1970 年的水平，未来我国城市化具有很强的潜力（表 8）。世界城市化的发展经验表明，城市化进程中 30%到 70%的增长过程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我国目前正处于这样的过程中。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为 45.7%，与国际相比仍处于较低的水平，未来城市化的空间依然广阔（图 16）。

图 16 世界与中国的城市化比率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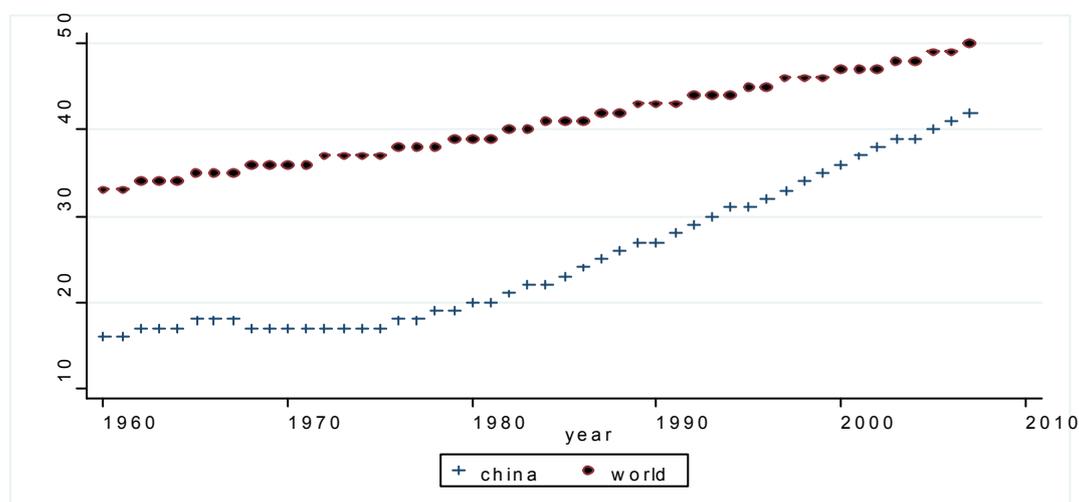


表 8 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美国 (1910)	日本 (1960)	韩国 (1970)	中国 (2007)
城市化水平	45.60%	43.10%	40.70%	44.94%

第一、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方式是多元化的，城市化不仅和经济发展存

<sup>10</sup>数据期间：1980-2007 年；分析对象国家是 OECD 的 30 个成员国及 11 个非成员经济体；人均收入采用 2005 年不变价的国际元。国际元的编制考虑了不可贸易品份额及各国间购买力平价对比。

在互动关系，而且和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城市化的推进，有利于促进投资、改善经济结构，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和国内有效需求<sup>11</sup>。

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中国经济依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尤其是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很多产业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首先，城市化必然带来投资的增长。依据我们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根据表 9 的结果，可以看到投资率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确实存在一个显著的倒 U 型曲线关系。根据一般的国际经验：当城市化率在 40-60%时，投资率最高。此后，投资占 GDP 的比重将开始下降。按照目前中国约 45.7%的城市化率，那么未来高速的城市化必将带来投资的增长，包括道路、排水、电力、通讯、垃圾和污染物处理等基础设施投资，也将引发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

**表 9 投资率与城市化间关系**

	系数	T 值
Urban_ratio	1.014	17.535***
Urban_ratio^2	-0.855	-17.561***
常数项	-0.040	-2.352
中国常数项	0.142	
R <sup>2</sup>	0.52	
样本量	1691	

其次，与投资率相反，消费率往往与城市化水平间呈现正 U 型的关系。相比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相同的城市化水平下，中国的消费率偏低了 24%多。根据这个正 U 型曲线，表 10 给出了一般的国际经验：当城市化水平在 60-70%时，是消费率的底部。此后，消费占 GDP 的比重将开始上升，而之前则不断下降。城市化会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

**表 10 消费率与城市化间关系**

	系数	T 值
Urban_ratio	-1.046	-12.532***
Urban_ratio^2	0.754	10.527***
常数项	1.092	45.366***
中国常数项	-0.247	
R <sup>2</sup>	0.52	
样本量	1637	

此外，服务产业的发展也是与城市规模的扩张密不可分。比如，物质流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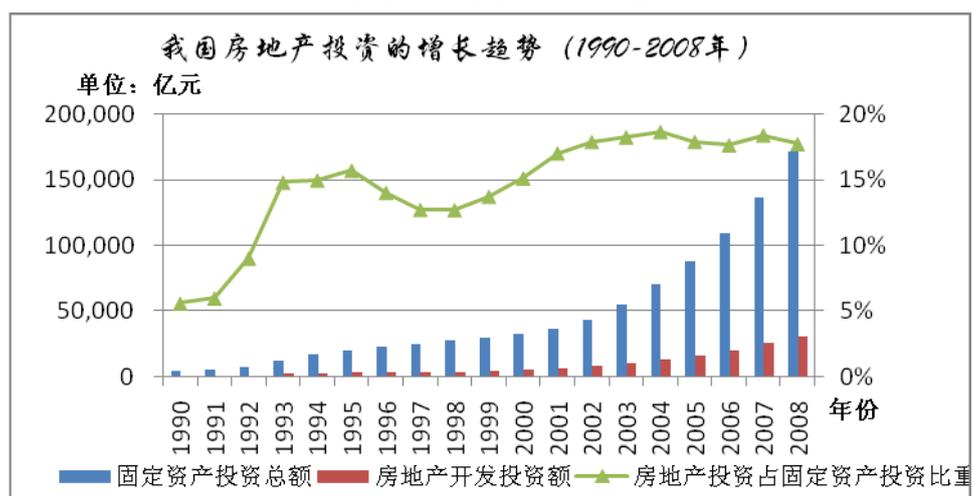
<sup>11</sup> 本节更详细的研究成果参见分报告《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世界经验与对中国的展望》。

通讯服务、金融与法律服务、要素市场与交易体系等，需要依托于城市的大工业体系发展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而按照我们的研究，在同样城市化水平下，中国的第二产业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高 6.5 个百分点，而中国第三产业比重与城市化水平比较符合世界规律。这未来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境况改变过程中，服务业也将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城市化将进一步推动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并且是维持投资增长速度的重要载体；同时，由城市化带来的社会保障、教育及卫生等公共事业的发展将有效扩大国内需求。**

城市化进程和城市人口住居条件的逐步改善将进一步推动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从投资来看，1990-2000 年房地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比例仅为 12.23%，而进入新世纪后，2001-2008 年这一比例的年均数值是 18.0%（图 17），房地产投资已经占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约 1/5，而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这表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推动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从长期来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继续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仍将维持较高的投资增速。

**图 17 我国房地产投资的增长趋势：1990-2008**



同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社会对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的需求不断加大，未来将使得局面的消费开支增加，从而有效拉动国

内需求，因此城市化过程对经济的拉动是多元化的，既有投资拉动，又有需求拉动，是匹配供给和需求的重要载体，潜力巨大。

**第三、重视城市化的原始资本累积是推进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探索并推进农村土地，尤其是宅基地的资产化将有助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

30年前，中国改革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改革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造了农村市场的微观基础，通过旨在放松约束和降低管理成本的扩大土地经营自主权，降低劳动力要素流动门槛等措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效盘活了改革初期的农村经济，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革和城镇发展，农村土地改革为改革初级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分散、难形成规模效应，农村投资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开始凸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开始出现，由于并没有改变土地归集体所有的事实，使得农民和承包土地之间缺乏长期稳定的利益关系，农民无法扩大再生产，原有土地经验模式的绩效基础逐步失去。因此，就目前来看，中国当前的土地制度不仅农民无法离开土地到城市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而且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瓶颈。

首先，中国最大的内需在农村，因此内需转换的关键在于刺激农村经济的增长。而新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将有力改变7.3亿农民的收入分配格局，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向内需转变以及加快城市化进程都至关重要。

农村最大的要素在于土地，土地不仅是一种生产性要素，更是一种资本性要素，因为它涉及到包括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权、要素资本赋权、发展权等在内的市场化三农赋权制度改革。因此，有必要推动新一轮的土地改革，释放土地和劳动力的潜能，通过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带动中国内部的资源、人力、资金等自由流动，盘活更多的资产加入到经济增长之中，从而突破当前经济增长的困局。我们认为，新一轮的土地改革应当从宅基地的改革起步，循序渐进，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农民通过宅基地的买卖获得一次性的大额财产性收入，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在宅基地自由买卖的同时，停止新的宅基地的审批，可以保护当前日益缩减的宝贵的耕地资源，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打下坚实的基础，为经济的持续发展解决后顾之忧。

其次，从居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也很有必要给予农民一次性的财产性转移支付。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居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依然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而财产性收入与发达国

家相比还远远未发挥主要收入来源的作用，其在农民收入构成中比例很小，2007年，财产性收入只占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总额的2%。因此，新一轮的土地改革是社会财富的一次重新再分配，通过土地的买卖和流转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可以极大的增加社会总财富，释放巨大的农村消费市场，有效的吸纳当前经济中的过剩产能，解决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

当然，新一轮的土地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间会面临重重阻力和困难，社会和经济会经历一个“阵痛期”，但只要政府措施得当，控制有效，新一轮的土地改革一定会顺利突破重重困难，积极探索农村土地的资产化，将为城市化提供重要的原始资本，并有效的支撑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3、服务业提升的空间巨大，未来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的根本来自于消费需求的提升以及生产型服务业围绕制造业的展开与深化，最终形成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

表 11 世界 GDP 产业分布

国家和地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0	2007	2000	2007	2000	2007
世界	<b>3.6</b>		<b>29.2</b>		<b>67.1</b>	
低收入国家	<b>30.6</b>	<b>24.8</b>	<b>24.1</b>	<b>27.7</b>	<b>45.3</b>	<b>47.5</b>
高收入国家	<b>1.8</b>		<b>28</b>		<b>70.1</b>	
非经合组织成员国	<b>2</b>		<b>35.6</b>		<b>62.5</b>	
经合组织成员国	<b>1.8</b>		<b>27.7</b>		<b>70.4</b>	
中国	14.8	11.7	45.9	48.1	39.3	40.2
印度	23.4	17.8	26.2	29.4	50.5	52.8
日本	1.8		32.4		65.8	
韩国	4.9	3	40.7	39.4	54.4	57.6
美国	1.2		24.2		74.6	
阿根廷	5		27.6		67.4	
巴西	5.6	4.9	27.7	30.6	66.7	64.5

中国服务业在 GDP 中的占比过低是制约中国产业发展和需求提升的一个核心因素。事实上，目前中国服务业在 GDP 的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低收入国家水平、高收入国家相比分别低 30 个百分点、7.3 个百分点和 33 个百分点，即使与印度、韩国、巴西等国相比也分别差 12.6 个百分点、17.4 个百分点和 24.3 个百分点。由此，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其服务业发展的可能空间之大与中国消费发展的空间大致相当的。如果我们的第三产业占比能够在未来 15 年达到世界

平均水平，那么，每年提升的空间将达到 2 个百分点，带来的 GDP 增长也直接高达 4 个百分点左右。为什么服务业占比的提升能够带来如此大的推动呢？其核心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通过提高服务业的产业关联性来挖掘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

服务业的变化原因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服务业作为最终产品的需求与服务业作为中间产品的需求。由于服务业的产出性质，服务业在最终使用方面，主要用于消费。在早期，西方服务业的发展主要是最终需求，或者是消费需求拉动。但是，随着一些产品设计、市场销售越来越多地分包出去，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这加大了服务业用于生产的比例，同时服务业作为中间产品用于生产的比例扩大了。这种服务业经济结构关系的改变，影响到服务业的发展趋势的变化。

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联系与国外相比表现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制造业投入中服务业只占很小的份额，而服务业产出的使用方面中间使用的比例却相当高。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来看，制造业所需的投入中最主要的还是本部门的中间产品，制造业投入中的制造业产品的份额接近 50%。从连续多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可以得到，服务业占总投入的比重 1992，1995，1997、2002，2005 各年分别为 13.5%、10.3%、9%、12.2%、11.6%，可以看出这一结构基本上是稳定的。在服务业所需的投入中最主要的则是制造业产品，服务业中制造业的投入份额大体稳定在 24%左右。

在服务业分配结构上，我国服务业用于中间使用的比例却异常的高，表明服务业部门更多受生产的拉动，而较少受最终需求拉动。在服务业分配结构上，中国服务业用于中间使用的比例却异常的高。1992、1997、2005 用于中间使用的比例在 56.7%，54.7%、53.8%，中间使用的比例尽管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从而与西方国家相反，但中间使用竟然超过国内最终使用，保持在国内总使用的一半以上，比西方国家 2000 年时的水平还要高。

从细分类的服务部门情况看，以 2002 年情况为例，制造业对服务业的投入需求中，主要是对零售批发、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与其它企业服务，实际上主要是传统服务业。与美国 2000 年的投入结构相比较，美国 2000 年制造业投入中服务业比重为 21.5%，而我国 2002 年为 12.2%，这中间差了 9 个多百分点，主要差别在于研发投入上的差异，这一项就差了近 3 个百分点。具体从细分类的服务业的情况看，机器设备租赁、计算机及相关服务、金融保险、交通运输业中间使用的比例在 80%以上，其他企业服务、邮政与电信、批发与零售贸易中间使用

的比例也在 70%以上。可见这些部门主要是由生产所拉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消费需求的不足成为制约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从我们对西方的实证研究来看，总体上，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兴起并不如一般所认为的是由于收入水平上升，人们提高对服务产出的需求所带来的，实际上主要是由于产业联系的深化所带来的。

由于与西方发达国家服务经济的经济性质相反，中国经济总体上表现出制造业为主的特征。这表现为经济份额上制造业为主；行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上服务业的速度始终低于制造业的速度；制造业投入中更多使用制造业本身，而较少使用服务业投入，且变化较小；产出的使用去向上中间使用偏高。因此，要改变技术上只是集中于如何生产产品的传统思维和投入方式，而要加强围绕生产过程的各种服务业的展开与深化，来提升最终消费对服务业的提升的作用。

**第二、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对有效提高制造业生产率有明显的作用，服务业的提升将进一步提高和强化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从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看，根据 OECD 的数据，通过计算得到的结果（表 12）：发达国家的数表明，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率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特别是美国。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美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保持稳定，而服务业生产率则有所上升，德国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生产率都经历了上升，只有日本经历了下降。结果美国、德国总体生产率是上升的，而日本则是下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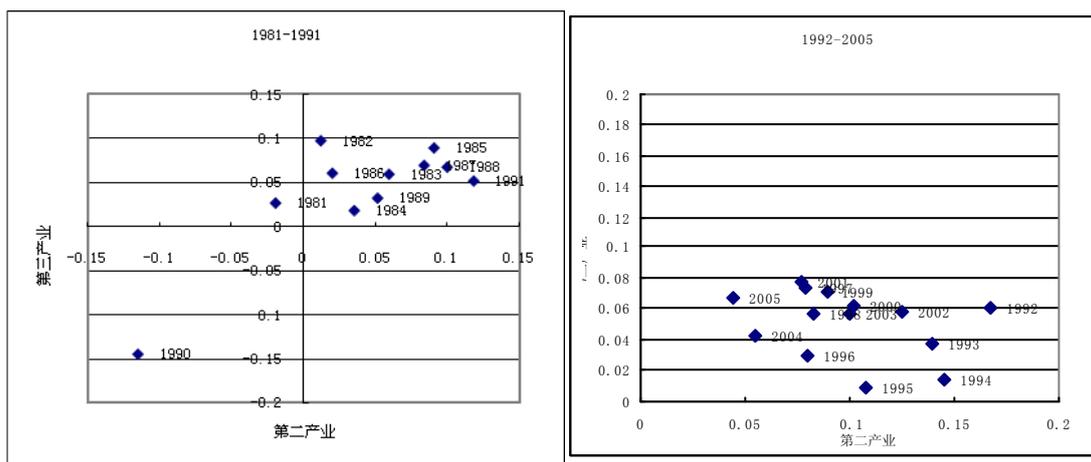
**表 12 美国、日本和德国生产率的变化**

	总生产率增长率		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率		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	
	1980-1990	1990-2001	1980-1990	1990-2001	1980-1990	1990-2001
美国	1.3	1.5	3.5	3.5	0.6	1.6
日本	3.2	1.2	3.9	2.6	2.5	1
德国	1.4	1.7	1.7	2.4	1	1.2

注：生产率按单位就业人员的增加值比率计算。

从我国的情况看，我国二三产业间生产率增长率差异程度是不断变化的，表现出阶段性的差异。90 年代之前，第二产业的生产率增长率并不明显比第三产业高，但是很明显在 90 年代以后之后，两者生产率之间的差异显得非常稳定。绝大多数年份中制造业的生产率增值率高于服务业。从图上看几乎所有年份都落在 45 度线的右边（图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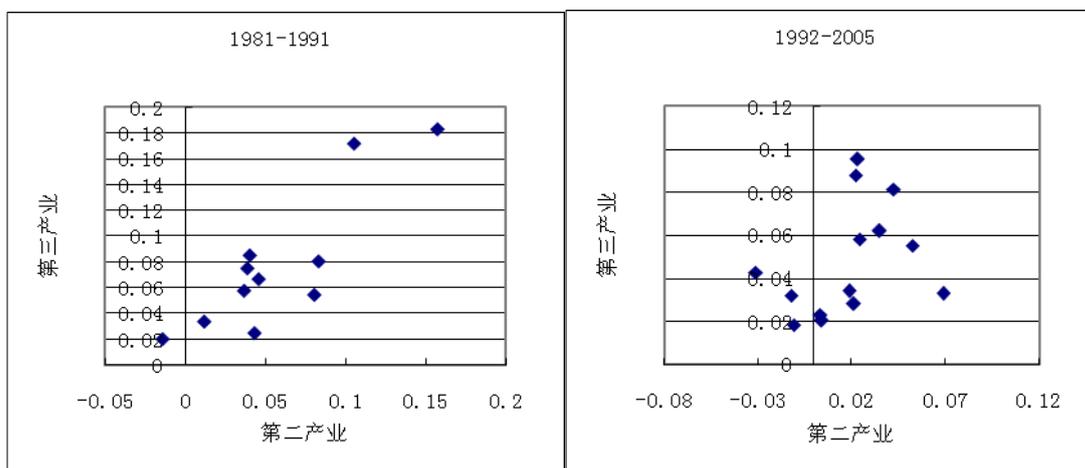
**图 18 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生产率增长率**



第三、服务业对于提升就业的空间很大，公共政策要充分考虑并重视社会服务业和卫生体育及社会保障等服务业对于吸纳就业的重要作用。

从就业增长率来看，在 90 年代以前，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就业增长率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是在 90 年代以后，大部分年份中服务业就业的增长率要快于制造业的就业增长率。从服务业的内部就业结构上看，就业增长最为明显且占最大份额的是批零贸易及餐饮业，2003 年占服务业就业的 41%。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在就业份额上位居其次，占服务业就业 17.4%，但是长期来比较稳定。

图 19、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率



从细分类的服务业情况看，大部分年份里，贡献最大的是其他服务业（主要包括社会服务业、计算机服务业等其他行业、卫生体育及社会保障、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公共管理组织等），其次是批零贸易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就业增长贡献很小。这一点可以从我们测算

的完全就业乘数得到进一步验证。从完全就业乘数来看，批零贸易及餐饮业（1亿元最终需求带动0.2923万人就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0.2804）、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0.2448）、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0.2195）等服务业部门高于制造业，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的完全就业乘数较小（表13）。

**表 13 各部门的完全就业乘数** **单位：万人/亿元**

部门	就业乘数	部门	就业乘数
采掘业	0.1311	金融保险业	0.1099
制造业	0.1907	房地产业	0.0643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1209	社会服务业	0.1699
建筑业	0.2771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0.2195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0.2448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0.2804
批零贸易及餐饮业	0.2923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0.1783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0.2046

4、明确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作为一个高附加值竞争源泉是未来中国经济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未来中国在成本优势削弱的情况下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在加大自主创新和和技术引进的条件下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转型、促进产业升级，是维持未来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在开放条件下，自主创新是突破“有限后发优势”，规避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深化专业化潜力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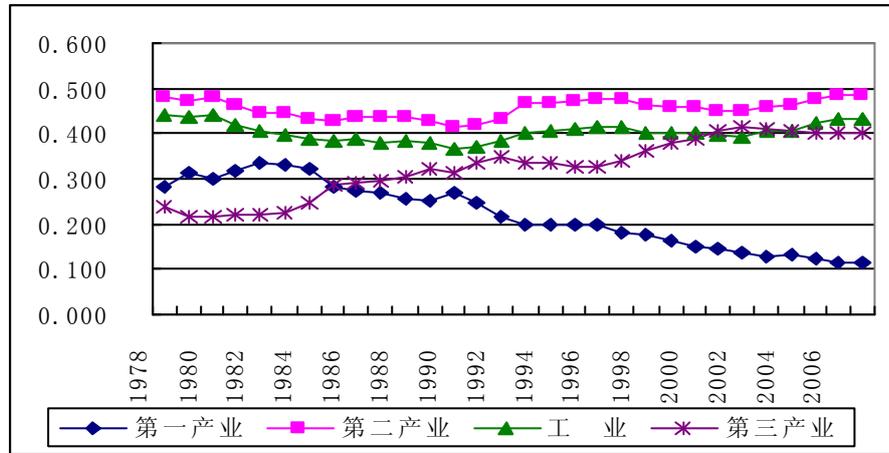
第一、技术研发投资上的不足以及投资的质量问题导致技术进步贡献率下降，导致我国的产业结构长期处于低层次的水平，未来经济结构亟待转型。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sup>12</sup>，我国经济三十年的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在不断下降，从1979到2007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9.6%。从80年代到90年代，其贡献率大幅增加了约8个百分点，但2000年之后，又下降了约7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在于技术研发上投资的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的质量问题影响了科技进步的速度和效果。从时间段1990-1999到时间段2000-2007，中国的资本增长率提高了约4个百分点，达到了14.16%，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了约12个百分点，达到了66%，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却降低了约7个百分点。资本投入的高速增加和金融市场的完善导致的一系列诸如资金的流向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失调和资源配置结构不合

<sup>12</sup> 参见分报告《中国经济增长因素：1980-2007》。

理等问题很有可能会导致科学技术向经济效益转化效率的降低。

图 20 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



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构成看，由于技术创新的不足，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低层次的水平，三次产业的比重失调。2008 年我国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分别为 11%、49%和 40%，第二产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一直较低，我国服务业的比重一直没有超过第二产业（图 20）。在技术创新较弱以及对经济贡献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未来加大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可以有效改善我国的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升级。

**第二、在开放条件下，要突破“有限后发优势”，唯有进一步加大技术进步的投入。**

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通过 FDI 的引进和对外贸易促进了中国企业技术的升级。对外表现为高新技术出口/比例从先进国家或地区引进 FDI 以及与先进国家或地区发展贸易关系都产生了明显的“外溢”效果和“干中学”效果。相比 2007 年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品占制造业产品出口中占 19%，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已占工业制成品的 30.1%。中国已成为高技术产品的大进口国和输出国。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中高技术出口的比例从 2004 年以来没有变化，基本维持在 30%左右的水平。在 2005-2007 年的出口促增长的“黄金期”，中国的高技术出口占工业制成品的比例反而下降了 0.5%（由 30.6%下降到 30.1%）。这一点与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一致的。依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9 年中的数据，2000 年制造业出口的 82%和增加值的 79%是高收入国家创造的，2006 年高收入

国家和地区两者的比例依然高达 73%和 76%。这表明，尽管发展中国家高技术出口增速在上升，但发展中国家的高技术出口大多是低附加值的高技术产品，出现了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扩散的进程中始终处于“有限后发优势”，自主创新不足。

从中国的高技术出口来看，90 年代中期之后，一般贸易出口的高技术产品所占比重就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 1996 年的 14.3%下降到 2003 年的 7.2%，直到 2007 年才上升到“九五”中期的水平。2007 年，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各类贸易方式中，一般贸易出口占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 11.2%，而加工贸易方式占当年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例高达 85.4%。其中进料加工贸易又是我国加工贸易的主要形式，其出口额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比例达到 84.9%<sup>13</sup>。加工贸易在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充分说明了中国出口的大部分高技术产品仅为其他国家的代加工产品，是高新技术中的低附加值产品，这显然是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转移的结果。这一点可以从贸易主体、贸易顺差和逆差上得到进一步验证。2007 年中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中外资企业占出口和进口分别占出口和进口总额的比重为 86.6%和 79.4%，而内资企业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和进口占高技术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只有 20.5%和 13.1%。在贸易差额上，外资企业是贸易顺差的主体，其中外商独资企业的贸易顺差高达 564.1 亿美元。而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的是贸易逆差主体，2007 年达到 123.4 亿美元。因此，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体上是贸易顺差，顺差主体是外资企业，而大部分内资企业仍有较高的贸易逆差。

可见，尽管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快速的学习过程建立一定的技术能力，即通过创造条件来引进、消化并吸收部分国外先进技术，可以将发达国家的创新迅速转化为商品形成挑战发达国家的国际竞争力（Porter and Opstal,2001）。但要形成自主性技术，提高核心竞争力，还必须通过在研发领域和技术人才上的大量投资获得创新能力。依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9 年《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公布的最新 R&D 数据来看，中国 R&D/GDP 比例 1999 年以后才开始逐步上升，2007 年达到 1.44%，高于同期俄罗斯的 1.12%、巴西的 1.11%，但与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国家总体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美国、日本和德国的 R&D 费用分别是中国的 7.6 倍、3.1 倍和 1.7 倍。2007 年中国研发人员人均 R&D 经费比例更低，在可获得数据的 38 个国家（地区）中，仍只列第 33 位，约为德

---

<sup>13</sup> 数据来源：<http://www.sts.org.cn/>。

国和日本的 1/6、英国的 1/5、法国和韩国的 1/4。而作为创新主体的大中型企业 2007 年的高技术产业 R&D 经费占 R&D 经费的比例只有 25.8%，这一比例远低于英国、美国和法国的 40%，韩国的 53.8%，也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30% 以上的比例。因此，制定恰当的技术创新战略——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并重的战略，特别是加大高新技术研发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能够摆脱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价值化的关键，也是深化专业化优势的关键。

## 第四部分 未来经济增长的模拟测算

上述未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新源泉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在总体支撑中国经济的增长呢？这需要我们在一个总体框架中对各种因素变化产生的后果进行总体性的模拟分析。

1、利用模型模拟预测，在增长轨迹转变与新增长源泉的支撑下，中国高速增长一方面依然具有高速增长的气势，另一方面也将出现总体增长速度缓慢下降的趋势，中国经济将步入一个较长时期的“次高速增长时期”。2008-2012 年的平均增速将达到 9.5% 以上，2013-2022 年将达到 8.26-8.82%，2023-2032 将达到 7.31-7.65%。

综合考量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及其政治经济周期特征，纳入相关因素，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 模型，区别从 2009 年起温和复苏而平稳扩张波动形态（正 S 型）、缓慢复苏而强劲扩张波动形态（反 J 型）与迅猛复苏而快速回落波动形态（倒 U 型），逐年预测 2009-2012 年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后，使用 C-D 型总量生产函数，细分 2013-2022 年间前 10 年与 2023-2032 年间后 10 年，分阶段预测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的历史趋势（T）及其置信区间上边界（*max*）和下边界（*min*）。

2009-2012 年间中国实际 GDP 增长速度的逐年预测结果如图 22 所示，2013-2022 年间与 2023-2032 年间中国实际 GDP 年均增长速度的分阶段年均预测结果如表 14 所示。2009-2012 年间温和复苏而平稳扩张波动形态（正 S 型）与 2013-2032 年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的历史趋势（T），组成 2009-2032 年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预测的基准情形。在先行时期经济波动基准形态（正 S 型）与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历史趋势（T）的基础上，滚动预测后续时期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历史趋势（T）及其上下边界（*max* 与 *min*）。得到的结论较为明确，从总体上看，中国经

济在 2009-2032 年期间将依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增速依然接近 9%，其中 2008-2012 年的平均增速将达到 9.5% 以上，2013-2022 年将达到 8.26-8.82%，2023-2032 将达到 7.31-7.65%。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一方面依然具有高速经济增长的态势，另一方面也将在从工业化、国际化、市场化向新的增长源泉转变过程中出现总体缓慢下降的趋势。

图 21 中国经济波动形态与经济增长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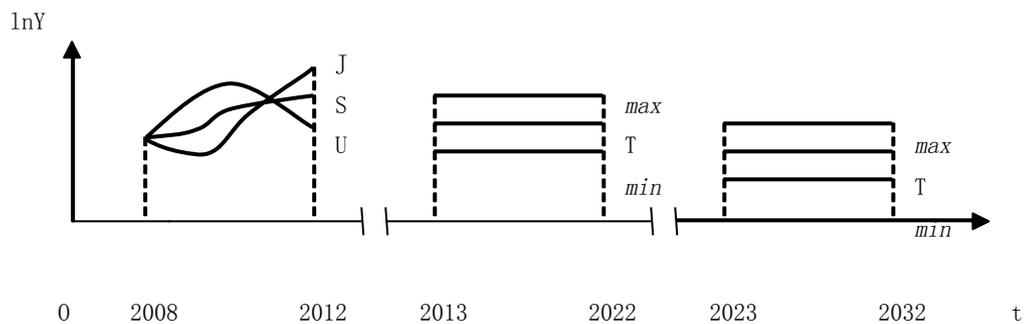


表 14 中国实际 GDP 增长速度：2009-2012 年 (%)

经济波动形态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08-2012 年平均
温和复苏/平稳扩张 (S)	9.00	9.04	9.85	10.09	10.43	9.68
缓慢复苏/强劲扩张 (J)	9.00	7.74	9.61	10.34	11.02	9.54
迅猛复苏/快速回落 (U)	9.00	9.68	10.90	9.53	9.06	9.63

表 15 中国实际 GDP 增长速度：2013-2032 年 (%)

区间	时期	2013-2022	2023-2032
	上边界 (max)		8.82
趋势 (T)		8.54	7.48
下边界 (min)		8.26	7.31

2、对未来“次高速经济增长”的要素分解表明，未来各种要素在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降发生巨大变化，资本因素将下降，而技术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大幅度提升，劳动因素将在 15 年左右的平稳期后出现上扬的趋势，但从绝对额来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依然具有严重的“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与高速度”的特色。

根据模型测算，进一步对经济增长要素进行分解，其结果表明，在 2008-2032 年期间，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将发生巨大的变化。2008-2012 年支撑经济增长达到 9.65% 的核心因素依然是资本和 TFP，其贡献率分别达到 68.5% 和 26.25%；2013-2022 年支撑经济增长达到 8.54% 的核心因素也是资本和 TFP，不同的是，资本的贡献率平均降低了 7.8 个百分点，而 TFP 的贡献率提高了 7.12 个百分点；2013-2032 年支撑经济增长达到 7.48% 的核心因素依然是资本和 TFP，不过三种投入的贡献率有进一步较大的调整，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劳动的贡献率分别提高了 2.46 和 1.41 个百分点，资本的贡献率分别下降了 18 和 10.2 个百分点；而 TFP 则与前两期分别提高了 15.85 和 8.73 个百分点。

表 16 中国经济增长要素核算

(%)

2008-2012 年						
情景 要素	正 S 型波动		反 J 型波动		倒 U 型波动	
	增长速度	贡献率	增长速度	贡献率	增长速度	贡献率
GDP	9.68	100.00	9.64	100.00	9.63	100.00
劳动	1.22	5.04	1.19	4.94	1.15	4.78
资本	11.07	68.62	11.04	68.71	11.10	69.16
TFP	2.55	26.34	2.54	26.35	2.51	26.06
2013-2022 年						
情景 要素	增长趋势 (T)		上边界 (max)		下边界 (min)	
	增长速度	贡献率	增长速度	贡献率	增长速度	贡献率
GDP	8.54	100.00	8.82	100.00	8.26	100.00
劳动	1.02	5.97	1.05	5.95	1.00	6.05
资本	10.36	60.66	10.51	59.58	10.12	61.26
TFP	2.85	33.37	3.04	34.47	2.70	32.69
2023-2032 年						
情景 要素	增长趋势 (T)		上边界 (max)		下边界 (min)	
	增长速度	贡献率	增长速度	贡献率	增长速度	贡献率
GDP	7.48	100.00	7.65	100.00	7.31	100.00
劳动	0.92	7.38	0.94	7.37	0.91	7.46
资本	9.45	50.52	9.62	50.29	9.27	50.70
TFP	3.15	42.10	3.24	42.34	3.06	41.84

上述这种要素贡献率的变化趋势可以清楚看到：第一、未来单纯要素投入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将出现较大的变化，来自技术提升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得因素将大幅度提升，其贡献率超过了 40%，提升幅度将达到 60%；第二、劳动力的作用虽然在未来 10 年内依然处于较为平稳的地位，但是进入到第 2 个 10 年由于中国劳动力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其贡献率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提高 50%，这说明目前在战略上重视劳动力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日益重要；第三、虽然资本在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幅度下降，下降幅度在三个阶段中高达 26.3%，但必须值得重视的是，其绝对作用依然十分庞大即使在 2032-2033 年间的高级阶段，资本要素仍然在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其贡献率依然高达 50.52%，因此，在中国国民收入的高储蓄倾向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可能依然会延续“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模式”，投资驱动具有准内生增长的性质，单纯压低投资或降低增长目标都可能面临更深层次的问题。

3、从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来看，未来“次高速增长”的结构都处于良性调整的过程中，但调整的速度较慢，人们所期望的快速结构性调整与增长方式的调整并没有出现。与此同时，调整的模式具有明显的需求先导型、产业内部深化等特点。

利用模型，我们可以进一步对于未来“次高速增长”进行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进行分解。其结果如下：

**表 17 中国经济增长供给结构 (%)**

2008-2012 年						
情景 部门	正 S 型波动		反 J 型波动		倒 U 型波动	
	增长速度	贡献率	增长速度	贡献率	增长速度	贡献率
GDP	9.68	100.00	9.64	100.00	9.63	100.00
农 业	4.08	4.28	4.12	4.40	4.05	4.27
工 业	10.12	54.39	9.91	53.92	10.11	54.65
服务业	9.41	41.33	9.34	41.68	9.32	41.08
2013-2022 年						
情景 部门	增长趋势 (T)		上边界 (max)		下边界 (min)	
	增长速度	贡献率	增长速度	贡献率	增长速度	贡献率

GDP	8.54	100.00	8.82	100.00	8.26	100.00
农业	3.91	3.04	4.06	3.03	3.82	3.11
工业	9.01	54.93	9.28	54.75	8.71	54.83
服务业	8.72	42.03	9.03	42.22	8.44	42.06
2023-2032 年						
<b>情景</b>	<b>增长趋势 (T)</b>		<b>上边界 (max)</b>		<b>下边界 (min)</b>	
<b>部门</b>	增长速度	贡献率	增长速度	增长速度	贡献率	增长速度
GDP	7.48	100.00	7.65	100.00	7.31	100.00
农业	3.62	2.12	3.71	2.11	3.47	2.08
工业	7.47	53.02	7.58	52.43	7.29	52.92
服务业	7.90	44.86	8.15	45.46	7.74	45.00

从供给结构看，在 2008-2012 年间、2013-2022 年间与 2023-2032 年间三阶段中，农业的贡献率分别为 4.31%、3.91%和 3.62%，工业的贡献率分别为 54.32%、54.93%和 53.02%，服务业的贡献率分别为 41.63%、42.03%和 44.86%。因此，我们可以十分清晰的看到，产业结构的调整虽然遵循克拉克定律，出现产业轮动，但是其总体的变化幅度并不十分显著，特别是工业的贡献率在度过这次经济危机之后将出现持续提高的局面，即中国目前所处的重工业化阶段虽然可能达到顶点，但是工业化依然处于中期阶段，工业化将在未来 10 年内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旋律，只有到中国完全步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服务业才能出现迅猛发展，才能在工业化的推动下超越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大推动力。

从需求结构来看，在 2008-2012 年间、2013-2022 年间与 2023-2032 年间三阶段中，消费对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41.06%、42.27%、46.96%；投资贡献率分别为 49.12%、47.61%、45.61%；而净出口的贡献率分别为 9.81%、10.12%和 7.43%。从这些模拟数据来看，我们会发现：第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 2008 年以前出现一个明显的转折性的变化，全面扭转了消费贡献下滑的趋势，并且在 15 年之后消费贡献率得到了明显回升，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回升的势头总体来说要比很多学者所想象的速度要慢得多，消费占 GDP 的比重出现回升基本要到 2015 年后才会出现，并且到 2022 年左右该比值才会回到 2001 年的水平；第二、净出口的贡献率在这轮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将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调，到 2022 年后才会出现明显的回落，因此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变过程也比很多专家相象得要漫长；第三、投资计量结果与要素测算结果基本一致，即资本依然是未来 20 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因此，投资贡献

率虽然处于下滑的状态，但是它在 GDP 的占比将在未来 8 年内出现持续提升的现象，到 2020 年左右才会出现明显回调。

**表 18 中国经济增长需求结构 (%)**

2008-2012 年						
情景 部门	正 S 型波动		反 J 型波动		倒 U 型波动	
	增长速度	贡献率	增长速度	贡献率	增长速度	贡献率
GDP	9.68	100.00	9.64	100.00	9.63	100.00
消费	9.51	40.84	9.55	41.80	9.41	40.55
投资	10.67	49.09	10.38	48.24	10.78	50.05
净出口	5.25	10.07	5.12	9.96	4.92	9.40
2013-2022 年						
情景 部门	增长趋势 (T)		上边界 (max)		下边界 (min)	
	增长速度	贡献率	增长速度	贡献率	增长速度	贡献率
GDP	8.54	100.00	8.82	100.00	8.26	100.00
消费	8.87	42.27	9.12	42.01	8.43	41.15
投资	9.01	47.61	9.35	48.01	8.82	48.43
净出口	6.13	10.12	6.29	9.98	6.04	10.42
2023-2032 年						
情景 部门	增长趋势 (T)		上边界 (max)		下边界 (min)	
	增长速度	贡献率	增长速度	增长速度	贡献率	增长速度
GDP	7.48	100.00	7.65	100.00	7.31	100.00
消费	8.18	46.96	8.24	45.97	8.05	47.39
投资	7.43	45.61	7.71	46.56	7.23	45.34
净出口	5.02	7.43	5.17	7.47	4.82	7.2

## 第五部分 次高速增长时期的动态平衡术

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言，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立、新型的全球分工格局已经出现、人口结构逐渐向老年社会过渡、城市化进程已经渡过其加速期、重工业化阶段已经完成。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支撑点已经开始步入其衰退期——体制变轨的资源配置效应开始衰退；全球化红利开始步入平稳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的加速增长将被贸易平稳增长所替代；人口红利已渡过拐点，人口负担的反向效应开始出现；城市化虽然依旧会稳步提高，但其产生的增长冲击力量在加速回落；工业化虽将进一步发展，但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将在工业的深度发展和服务外包发展的作用下而不断降低。

因此，人们看得见的一个增长源泉的大变革图景呈现在所有决策者和研究者的眼前——在不久的将来，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将替代目前的投资-外需主导型增长模式；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增长模式将替代资源密集增长模式；服务化驱动增长模式将替代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驱动模式、中西部崛起型增长模式将替代东部先导型增长模式。

但是，目标的明确并不等于路径的形成，如何驾驭中国增长模式的转轨不仅需要目标的明确，更需要我们掌握一系列的转轨技巧，以避免出现转轨进程在大上大下中出现经济体系崩溃、利益冲突激化、社会政治结构瘫痪等问题。结合前面的未来经济增长的情形模拟结果，我们认为，即使在未来上述目标是真实可行的，我们在朝着这些目标进发的过程中必须把握以下几大原则：

1、在需求结构转型过程中必须注重总需求三驾马车的动态平衡术，外需驱动转向内需驱动并不是等于简单降低净出口的规模、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也不是等于单纯地压制投资的规模。中国出口投资驱动增长模式不仅有其深厚的国际分工体系基础，更为重要的具有内部储蓄基础，调整出口-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不仅依赖于传统粗放的开放政策和投资政策的调整，更重要依赖于国际分工环境和内在分配-储蓄体系的变化，简单进行压低出口和投资的转型方法只会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在需求快速下滑与结构冲突激化的双重压力下出现崩溃的局面。

(1) 外需驱动→内需驱动调整中的动态平衡术

从长期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从目前的外需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变，但这种转变必须是在短期宏观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对平衡的约束下进行。因此，外需驱动→内需驱动调整中的动态平衡术的核心要点就是转型的速度不能过度破坏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对平衡，不能因转型而出现大规模的需求下滑型经济崩溃。

从国民收入恒等式  $(S-I) = (X-M)$  来看，宏观经济需求驱动到底以外需驱动还是以内需驱动为主体，不是主观决定，也不是政策调整短期的产物，而是国民消费-储蓄模式与国际分工-供求模式共同决定的，一个国家如果存在大量的净储蓄  $(S-I)$ ，这就必然意味着存在大量的净出口。如果为了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进行转变，人为大幅度改变出口导向政策，减少出口，其直接的结果就是被动存货投资将大幅度增加，国内市场将面临大萧条和产能过剩急剧的增加。因为储蓄水平在短期难以改变，它不取决于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而是取决于中国收入分配体系的变革、社会安全网的建设、人口红利的逆转、部分社会服务的公共化、消费层次的升级以及文化习惯的变迁等长期因素。从未来 3-10 年来看，虽然这些因素会出现各种变化，但是中国高储蓄模式在近 20 年内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前面的计量结果来证实了这种判断。

与高储蓄国内状况相对的是，整个世界“新三角”分工体系在新世纪刚刚完全确立，美国以“金融与技术创新”为主体的一角、日本和德国以“高端制造业”为主体的一角、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以“低端制造业和原材料”为主体的一角的国际分工模式并不会马上崩溃，全球不平衡问题也不会像很多学者和政府官员所判断的那样会在 3-5 年内快速消失。因此，世界对于中国的需求虽然已经告别了“入轨”过程中的加速增长期，但依然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较高的平稳增长。同时，从外部不平衡逆转的历史来看，中国未来平衡的力量并非在于出口的减少，而是资本的输出。中国贸易战略不宜在近期出现人为的大幅度调整。

从中国内需和外需的联动性来看，简单减少外需并非增长模式转变的核心支点。因为，中国经济的需求结构在短期存在强烈的刚性：一是“出口-投资联动机制”和“出口-收入-消费联动机制”，这将决定，在出口减少的同时，内需不会自动出现一个扩张，相反还会出现大幅度的下滑；二是外需与内需在供给结构上的相互替代性并不高，大量用于外销的机电产品并不适合于中国市场。因此，即使内需能够弥补外需在总量上下滑的幅度，但是结构上的矛盾也会带来短期经济结构性的萧条，进而引发

相应的总量和社会性问题。因此，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缓和中国经济内需与外需之间的联动性、促进内需与外需在供给结构上的可替代性，简单实施需求结构转型战略将带来宏观经济的萧条。

这就决定了：第一、中国不能在内部储蓄-消费结构不进行大幅度调整的前提下进行外需的大幅度调整，有关国民储蓄倾向的内部制度性调整是中国不平衡模式调整的核心基础；第二、中国不能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刚形成初期进行全面的“逆格局”调整，外向型战略只能进行结构性调整，而不能进行全面的定向性调整。第三、中国不能在内需和外需存在大量总量联动性、结构非替代性的条件下进行全面收缩外需，内部消费-投资以及收入等变量之间的自我循环机制的扩大是外需调整的前提之一。第四、外部不平衡的调整重点不宜在经常项目顺差的调整，而应当在资本项目顺差的调整，中国应当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过渡；贸易顺差的调整核心不应是总量的调整，而应是产品结构、贸易方式以及贸易区位等方面的结构调整，外需总量调整的速度不仅应服从内部不平衡的调整速度，而且应当慢于外需结构调整的速度。

## **（2）投资驱动→消费驱动转型中的动态平衡术**

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在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任何一个民族不是依靠投资来获得效用的。因此，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必定是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投资各种特性决定了投资的过度调整很容易使宏观经济偏离中短期的稳态增长路径。

目前中国的高投资有其客观的基础，投资驱动模式向消费驱动模式转变的核心不在于投资增速的降低，而在于消费增速的相对提升，投资增速不仅在中期具有保持高速度的必要性，而且在外需向内需转变的开始阶段还有在短期提高增速的必要性。

首先、高储率决定中国必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高投资的状态。一个国家如果在储率不降低的前提下，而大幅度同步降低投资和出口，其带来的后果只能是总需求的大幅度降低，供求平衡被剧烈打破，经济萧条立即出现。因此，在宏观经济平衡运转的前提下，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要点不是率先降低投资，而是在提高消费和降低整体国民储蓄率。

其次、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也决定了中国需要高速的投资增长。中国经济虽然经过了 30 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它依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期，其不到 2000 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了它刚摆脱初级发展阶段。这些阶段定位决定了需

要进行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例如采取东亚发展模式的其他国家在其工业化阶段的平均投资水平投资增长速度也高达 16-20%。韩国在 1989-1997 年间平均投资率达到了 37%，日本在 1965-1976 年平均投资率 34%。其他发达国家在早期也有这种现象。

再次、为了保持宏观经济总体相对平衡，中国经济由外需去动向内需驱动模式的转变也需要投资在中短期内有一个持续高速增长。否则，外需向内需的转变很可能因为总量的失衡而夭折。

从投资调整的动态规律来看，由于投资在动态中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双重的——第一期的投资构成该期的总需求，但它构成了下几期的供给，因此，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那就是在短期存在过热的压力，在中长期存在产能过剩的压力。因此，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在中长期的宏观平衡力量往往依赖于持续的出口增长和进一步提高的投资增长，这种平衡的逻辑也决定了出口-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具有强烈的惯性，投资增速存在强烈的“棘轮效应”。因此，要打破这种平衡增长的逻辑，一方面要寻找到与前期高速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相匹配的新的有效需求，或进行大规模产能过剩的治理；另一方面投资增速也不能马上快速下调。国民经济平稳中转型不是简单地决定于投资的减少或投资的增长，而是决定于动态过程中投资增长速度在对总需求的影响是否与投资对总供给的影响相均衡。中国外部不均衡和内部结构性的调整在中期内需要一定的高投资增长增长速度，在长期需要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在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对平衡的条件下进行结构性调整，在实现实际 GDP 与潜在 GDP 在速度相对一致的增长中实施“正向调整”与“反向调整”。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动态平衡术：

第一、消费和储蓄的调整不仅是外需驱动增长模式转向内需驱动增长模式的核心前提基础，也是投资驱动增长模式转向消费驱动增长模式的核心基础。

第二、在外需驱动增长模式转向内需驱动增长模式、投资驱动增长模式转向消费驱动增长模式的两大增长轨迹转变进程中，前者具有一定的优先性，即在中国目前高储蓄率和国际分工格局等因素的影响下，高投资依然在中期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第三、投资在总量上高速增长具有中期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投资没有调整的空间，投资结构调整应当成为政策的核心要点之一，同时投资结构的调整还需要与产能过剩

的调整相匹配，从而摆脱“利用新投资来满足旧产能过剩，新投资又形成新产能过剩”的循环怪圈。

第四、高速投资增长可行的支撑点应当在于人力资本大幅度投资、生产型服务业大幅度投资以及软基础设施的投资之上。

2、在城市化加速的进程中必须重视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平衡，城市化带来的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是以全社会的社会改革为前提的，城市化的速度快于社会改革的速度不仅会带来城市化成本急剧增加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很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结构崩溃的导火索，使高速经济增长失去稳定的社会环境。

中国城市化虽然依然存在 20 个百分点以上的提高空间，但是，城市化并非单纯的经济改革，其本质是社会改革的产物，因此，其自然的逻辑是“社会改革与城市经济发展带动城市化、城市化带动相应的投资和消费的增加，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继而进一步推动城市化。在这个逻辑链中凸现的最为明显的就是：

第一、农村人口向城市进行转移并非单纯的“经济吸引”，代表现代生活方式和文明发展方向的城市文明是未来人口转移的核心动力之一，“文明移民”主导下的城市化将使城市化的社会成本加速攀升。

第二、即使“经济移民”为主体的城市化，如果没有户籍制度、养老体系、社会安全网、政府治理、农村土地制度以及其他公共设施建设改革与之匹配，城市化也难以承受经济波动带来的强烈的社会外溢效应。

第三、必须充分认识到未来产业发展模式以及就业模式变化的规律，不能过高估计服务业的发展所吸收的劳动力的数量。因为未来 25 年中服务业的份额虽然稳步提升，但提升的幅度将远小于一般人所估计的程度。

第四、城市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可能成为制约城市化带来的各种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的核心因素。

3、工业化驱动模式向服务业驱动模式转型中必须高度重视服务业与制造业、服务业与消费之间的互动，而不能简单通过打压工业投资和工业发展来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也不能通过简单提高服务业的投资来增加服务业在 GDP 的份额。进一步工业化、消费水平的提升与服务业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依然是服务业增长贡献率进一步提升的三大要点，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层次化分类处理。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中国服务业虽然存在 30 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但是，中国服务业在 GDP 增长的贡献率以及所占的份额在未来 25 年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这种状态产生的核心原因在于服务业发展在本质上存在自身的规律。

第一、生产性服务业在本质上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未来 25 年的次高速增长时期，中国第二产业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服务业的发展依然没有超越其工业依附的特性，因此，对于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必须通过工业的进一步深化、通过工业服务的外包与分工的发展来推动。

第二、消费性服务业在本质上是消费水平大幅度提升，消费层级发生质变的产物，它的发展基本不遵从“供给创造需求”的逻辑，因此，消费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依然是消费性服务业发展的核心，而消费的增长以及消费结构的进一步革命是比较缓慢的，它需要以中国的收入分配机制、社会保障体制等社会性制度发生巨大变革为基础。

第三、而对于金融、航空、电讯等混合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受制于目前的各种行政性管制，同时也受制于目前全球分工格局固化的约束。发达国家的高端服务业的输出以及各种管制对于本国高端服务业的约束将使这些产业的发展面临“两难困境”，这需要我们在战略上权衡放松管制与对外开放的冲突。

**4、在向新技术、新能源、新产业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进程中，必须重视需求型技术变迁与供给型技术变迁之间的匹配，重视产业的技术基础与经营基础的匹配、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匹配，避免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盲动症驱使下，陷入“新能源陷阱”与“动态比较优势狂躁症”之中。**

新技术、新能源以及新产业是任何一次高速增长所渴求的，但是这些因素的获得不仅取决于对技术的需求，更重要取决于技术的供给以及技术实施的市场化与产业化基础。任何民族都渴望获得动态比较优势，以快速爬上国际分工体系的最顶端，以获取来自创新、垄断以及先发优势的超额利润，但是没有坚实的静态比较优势，动态比较优势是无法形成的。

日本 80 年代在技术创新的经历、拉美在 60 年代在动态比较优势战略上的失误以及当前我们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出现的低级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都可以提醒我们，在向新技术、新能源、新产业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进程中必须切记冒进。

事实上，通过前面计量的分析，我们看到 TFP 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在未来大幅度提升，但这种提示可能更多地来源社会政府改革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以及技

术的深化。没有制度改进的技术赶超一是不可能出现，而是出现也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5、应当重视后工业社会目标与工业化社会目标之间的平衡，避免过度利用后工业社会的目标来评判工业化发展的各种措施，防止出现盲目跟随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措施，使我国政策目标出现“内在冲突”、“目标无解”的困境。

正如前面分析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工业化将在相当一段时期主导中国的发展。但是，目前充斥中国社会各界的观念是西方输入的新词汇——“绿色复苏”、“低碳经济”、“新能源经济”、“GNP 轻型化”，导致我们很多专家将“高增长、低投入、低能耗、新技术、低污染、高效益”作为增长目标，而这种目标在任何社会上都是无解的。

事实上，我们必须正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性，在政策制定上坚持以我为主，防止各种发达国家理论家带来的意识侵蚀。后工业社会理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具有研究的价值，但它必定与中国社会存在巨大差异。中国改革 30 年走出的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在本质上不是后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

6、中国社会与政治结构往往需要中国经济应当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未来中国经济在增长模式转变和新轨道运行的进程中依然有保证高速增长的基础，增长目标不宜进行大幅度的压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变轨并非与高速增长存在必然的冲突，“在高速增长中调结构”依然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

正如前面计量模拟的结果表明，未来中国经济依然具有保持在 7.5-9.6% 的高增长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结构需要中国经济增长要达到一定水平。这集中体现在就业压力和体制转变中利益协调压力。中国经济增速的过快下滑不仅会带来就业水平的加速下滑，更为重要的是会带来增量改革的停滞以及利益协调的经济空间收窄。

## **第六部分 结论与政策建议**

### **1、本文的主要结论**

(1) 本文对中国过去 30 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传统源泉的分析表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立，新型的全球分工格局的形成，人口结构逐渐向老年社会过渡，城市化进程已经渡过其加速期，重工业化阶段已经完成，中国经济增长

的传统支撑点已经开始步入其边际递减或总量衰退的变异阶段——体制转轨的资源配置效应开始衰退；全球化红利开始步入平稳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的加速增长将被贸易平稳增长所替代；人口红利已渡过拐点，人口负担的反向效应开始出现；城市化虽然依旧会稳步提高，但其产生的增长冲击力量在加速回落；工业化虽将进一步发展，但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将在工业的深度发展和服务外包发展的作用下而不断降低。

(2)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可能将转向“消费率提升”、“城市化加速”、“服务业发展”、“技术创新与技术深化”以及“社会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方面。考虑各种增长源泉的变异，利用模型模拟预测。结果表明，目前世界经济危机没有打断中国高速增长的趋势，但会缓慢启动增长路径的变轨。

(3) 在中国经济增长轨迹转变与新增长源泉的支撑下，中国经济增长一方面依然具有高速增长的气势，另一方面也将出现总体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下降的趋势，中国经济将步入一个较长时期的“次高速增长时期”。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 模型，我们预测中国经济 2008-2012 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将达到 9.5% 以上，2013-2022 年将达到 8.26-8.82%，2023-2032 将达到 7.31-7.65%。

(4) 通过对未来“次高速增长”的要素分解表明，未来各种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将发生巨大变化，资本因素的贡献将下降，而技术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大幅度提升，劳动因素的贡献将在 15 年左右的平稳期后出现上扬的气势。但从绝对额来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依然具有严重的“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与高速度”的特色。

(5) 从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来看，未来“次高速增长”的结构都处于良性调整的过程中，但调整的速度较慢，所期望的快速结构性调整与增长方式的调整并没有出现。与此同时，调整的模式具有明显的需求先导型、产业内部深化等特点。因此，人们原来所想象的“内需驱动模式替代外需驱动增长模式”、“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替代投资主导增长模式”、“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增长模式替代资源密集增长模式”、“服务化驱动增长模式替代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驱动模式”的增长模式大转变并非想象得那么迅猛。因此，我们一定要在注重转型调整的同时，防止急于求成的思想和运作，漫长的增长模式转变中需要坚持六大动态平衡术：1) 在需求结构转型过程中必须注重总需求三驾马车的动态平衡术，外

形驱动转向内需驱动并不是等于简单降低净出口的规模,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也不是等于单纯地压制投资规模。2) 在城市化加速的进程中必须重视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平衡。3) 工业化驱动模式向服务业驱动模式转型中必须高度重视服务业与制造业、服务业与消费之间的互动,而不能简单通过打压工业投资和工业发展来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也不能通过简单提高服务业的投资来增加服务业在 GDP 的份额。4) 在向新技术、新能源、新产业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进程中,必须重视需求型技术变迁与供给型技术变迁之间的匹配,重视产业的技术基础与经营基础的匹配、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匹配。5) 应当重视后工业社会目标与工业化社会目标之间的平衡,避免过度利用后工业社会的目标来评判工业化发展的各种措施,防止出现盲目跟随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措施,使我国政策目标出现“内在冲突”、“目标无解”的困境。6) 中国社会与政治结构往往需要中国经济应当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未来中国经济在增长模式转变和新轨道运行的进程中依然有保证高速增长的基础,增长目标不宜进行大幅度的压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变轨并非与高速增长存在必然的冲突,“在高速增长中调结构”依然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

## 2、中国经济增长源泉转变的政策建议

在向未来经济增长新的源泉转变的过程中,需要给予合适的政策配套,因此,主要的政策建议有以下几点:

**第一、把当前以“反危机、防恐慌”的短期应对政策,转向以经济转型和培育新增长源为着力点兼顾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正确理解经济周期性调整的必然性、在调整中建立新的经济结构与新竞争能力的必要性,在当前政府主导的刺激政策已见成效,经济企稳回升的情况下,应当及时把当前以“反危机、保增长”为主要内容和目标的短期宏观应对政策,转向以“调结构、扩内需”为主要目标和内容的并兼顾短期应对的宏观经济政策。一般说来,周期性经济调整具有强制调整经济运行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的功能,而同时在调整期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在下一轮经济增长中的竞争能力。因此,要防止短期过激应对政策导致的周期性经济调整不到位,而损坏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特别是,此次周期性调整是全球性的,如果其他国家调整到位并成功转型,我们将在下一轮的竞争中处于被动状态。从保持较长时期的持续较高增长速度的要求出发,我们应对此次周期性调整的宏观调控对策将

在较长时期内发挥作用，我们尤其要注意防止短期政策损害中长期目标。

**第二、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扩大居民收入占比，建立有利于提高消费率的消费需求刺激政策，形成以内需为主的需求结构。**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确实可以对居民消费需求起到相当大的扩张效应，而且这个效应要比仅在居民部门内部缩小收入差距带来的消费扩张更大。而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点，通过企业合理地增加劳动者报酬支付、增加分红和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和再分配中的收入比重得到合理的增加，从而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重。

首先，需要推进提高居民从企业获得劳动报酬的制度改革。（1）形成劳动者报酬决定的集体协商谈判机制，从根本上改变单个劳动力与用人单位在谈判中的不利地位。（2）进行税制改革。将目前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因为税制的转变，必然引导地方政府关注重点的转变，使其由招商引资转变为打造良好的消费环境，自觉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刺激消费需求增加，从而使税收增加。（3）建立健全涉及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各项法规，严格保护劳动者权益。这包括严格的劳动保护制度、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根据物价指数调节居民劳动报酬水平的制度，等等。

其次，需要推进有助于增加居民财产收入的制度改革。（1）从法律和产权制度上保证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财产。因此，更大力度保护普通居民的财产权，以及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靠劳动吃饭的机会，是最应该被“创造”的“条件”之一。（2）加强和完善资本市场立法，创新金融及其管理制度，为居民获得和拥有更多的财富创造出更多的金融工具。

再次，调整居民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可以起到扩张居民消费的作用，但这个作用要远远小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居民消费的扩张效应。因此，从长期来看，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是大力提升消费率的重要路径，也是未来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的必然选择。

**第三、积极、稳健推进城市化进程，探索并推进农村土地，尤其是宅基地的资产化将扩大城市化的资本供给，进而扩大国内需求。**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重要载体和源泉，是促进投资、改善经济结构，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和国内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研究表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方式是多元化的，城市化不仅和经济发展存在互动关系，而且和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城市化的推进，有利于促进投资、改善经济结构，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由城市化带来的社会保障、教育及卫生等公共事业的发展将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同时，城市化将进一步推动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并且是维持投资增长速度的重要载体。

(1) 鼓励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房地产市场过去是，现在是，未来还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源泉。要积极规范城市化进程中住房价格的定价机制，继续规范、完善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的分类定价环节。

(2) 重视城市化进程中的原始要素累积。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探索并推进农村土地，尤其是宅基地的资产化，给予农民一次性的财产性转移支付，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推进城市化进程中的原始要素累积。

#### **第四、构建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安全网。**

无论从扩大内需的角度，还是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我们都有必要对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改革。

(1) 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负责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无论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等，还是城乡“低保”等都是由地方政府负责。这样安排产生了若干不良后果。首先是存在效率损失。社会保险作用的大小和参与保险的规模相关，现行的安排事实上形成了若干分割的地区保险市场。养老、失业和医疗等风险不能在地区之间分享。其次，地区之间支付水平差异过大，社会保障的属地化不利于劳动力在全国各地合理配置。第三，地方政府面临平衡预算约束，在财力衰退时期，可能会减少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社会开支的减少既不利于地方稳定，也减少了经济复苏的动力。为了避免这些问题，有必要建立全国统一、由中央政府负责的社会保障体系。例如，由社会和劳动保障部统一负责全国社会保障中的养老、医疗和工伤事故险；由民政部统一负责全国的“低保”和其他救济事宜。

(2)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社会保障筹资机制。为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保障资金需求，各级政府首先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控制行政事业经费支出的过快增长，政府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以进一步压缩建设性支出，相应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比重。中央财政可以通过划拨国有资产、扩大彩票发行等多渠道继续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在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可通过发行社会保障特别国债适当平滑财政支出，减轻当期压力。地方财政也可视财力增长情况下建立相应的保障储备基金。同时，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自求平衡机制。

(3) 统筹城乡发展，完善以农村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要进一步落实对农村、农业“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向农村和农业倾斜。通过加大中央和地方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调整财政资金和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向，加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一是要加强法制建设，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保障建设体系中的作用。二是集中政府财力，支持农民根据本地经济发展和财力状况，在农村建立健全符合当地实际的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金在内的三条基本社会保障线，实现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依和贫有所济。三是继续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4) 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一是加快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保险制度，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完善鼓励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政策。二是加快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三是完善城镇医疗保险方案。四是推进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建设。五是适应城镇化加快的需要，加快建立符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优先解决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建设，尽快建立适应国情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切实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5) 加快发展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一是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二是完善农村供养制度。继续提高农村五保供养标准，并确保落实到位。三是积极发展城乡医疗救助。四是大力发展以扶老、助残、救孤和济困为重点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完善优抚安置政策，确保重点优抚对象的实际生活水平高于群众平均生活水平。五是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

### **第五、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结构转型。**

在加大自主创新和和技术引进的条件下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转型、促进产业升级，是维持未来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在开放条件下，自主创新是突破“有限后发优势”，规避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深化专业化潜力的关键。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并重的战略，特别是加大高新技术研发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能够摆脱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的关键，也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结构转型的关键。

(1) 明确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作为一个高附加值竞争源泉是未来中国经济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未来中国在成本优势削弱的情况下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结构调整不仅应当关注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更重要的是应当落实到新产业的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促进上，因此，新行业的战略规划、新行业进

入的开放、新行业技术的研发补贴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同时，还应重点支持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改变我国的出口结构。

(2) 对于产能过剩的治理应当是目前结构调整的一个重点，落后产能的淘汰以及亏损企业的淘汰应当是任何危机治理遵循的基本原则，因此，应当避免不分技术水平和行业分布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生产型补贴。

(3) 政府可以考虑推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的补贴计划，但对于更新的固定资产要制定较高的技术和环保标准。这样的补贴不仅有利于投资需求的提升，同时也达到结构调整的目的。

#### **第六、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扩大就业和培养中产阶级的产业载体。**

中国服务业发展未来提升的空间巨大，未来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的根本来自于消费需求的提升以及生产型服务业围绕制造业的展开与深化，最终形成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因此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现代服务业的竞争能力是中国增长源泉转变的重要因素，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将成为中国结构转型的重要产业政策。

(1) 大力发展生产型服务业，促使生产型服务业围绕制造业的展开与深化、使现代制造业与服务有机融合、互动发展。细化深化专业分工，鼓励生产制造企业改造现有业务流程，推进业务外包，加强核心竞争力，同时加快从生产加工环节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服务环节延伸。

(2) 放宽市场准入，加强与境外服务企业的合资合作，大力引进外资投向基础设施、金融保险、现代流通、旅游设施、公共交通、文化教育、医疗体育、社区服务等服务领域，加快服务业的国际化进程，提高服务业的市场化水平。

(3) 探索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城市化、市场化进程，做大服务业的总量规模，扩大消费需求。

#### **第七、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下，建设公民社会与公共财政。**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现代公民社会，建设公共财政，是中共中央对“十一”五年计划的要求和目标。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政府提供健全的社会基础设施和保障民生的制度。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保障中国经济进入次高速增长目标也需要社会需求的释放和公共财政的支持，特别是针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相关政策措施。我国是在社会转型、经济欠发达和体制转轨背景下推进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这就需要有公共财政体制的配套改革。因此，建立公民社会要求必须建立与未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目前，我国已基本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共财政体系的

框架已基本建立，但在保障民生，改善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还很不够。同时，公共财政体制本身还有待需要改进的地方。就公共财政体制而言。现行财政体制的有限分权制度导致了有限的地方政府竞争，这种有限的竞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会促进增长，但不可能具有长期的增长效应。有限分权和有限地方政府竞争已经导致了环境恶化、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弱化等。今后财政体制的调整首先是明确各级政策在公共服务和经济领域的职责，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税权；其次，按照公开、透明的原则重建预算制度，解决现行财政存在的严重“缺位”与“越位”的问题；再次，在赋予居民对当地政府预算的投票权的基础上，形成以当地居民为主体的标尺竞争机制；最后，这种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应该逐步实现，而不是一步到位。